

西部西藏的历史^①

伯戴克著 张长虹译

(罗马大学中东远东研究院 意大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藏文文献中记载的关于西藏西部地区的历史信息的条分缕析，勾勒出了西藏西部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段上从公元7世纪直至19世纪，跨越一千多年，大体分为象雄王国、西藏西部王国的形成、早期布让王国、亚泽王国的兴起、约1200—1400年的布让及古格和亚泽王国、约1400—1630年的古格王国、约1700—1900年的古格和布让等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对西藏西部的历史进行全面介绍。

关键词：象雄 阿里 布让 亚泽 古格 噶逻

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不能被强制性地放进一个普通的框架内。它本身的地理情况决定了有多少山谷就会不可避免地被细分为多少单元，其经济上（农业上或商业上）的重要性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活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每一个王国或公国均源自河谷地带。这些河流起源于大喜马拉雅山脉或其南侧区域，并形成了上部印度两支主要的河系：印度河和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实际上，上部印度河谷本身也为最大的王国——拉达克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对所有的王国而言，一些自然特征都是共通的。由于海拔和缺水超出了第一山脉，气候相当恶劣。大米和小麦在山谷的中等高度就无法种植了，青稞是山谷上部高达4000米或更高地区唯一可以生长的作物。人工灌溉几乎总是必需的，水源来自山脉溪流，只有少数来自大河，因为后者往往或多或少地切割出深深的峡谷，因此少有可能在其两岸形成平地。动物的饲养总是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在那些因海拔和干旱而无法发展农业的地区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这里的自然或政治边界是未经核实的。正式界定的边界曾经是（现在也是）或多或少地人为的，并且通常是现代人的创造。来自北面的牧人会定期翻山去南坡寻找更好的季节牧场。

从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一地区显示了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它为那些被推向更高谷地的少数人口提供了最后的避难场所，并且由于与世隔绝而避免了灭绝。整个喜马拉雅山南坡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博物馆。

王国的形成严格地限于当地，人口和经济的基础不足以支撑涵盖多于一个主要河谷的大的政体的发展和持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早期的象雄和晚期的拉达克，由于其内在

^① 本文译自：Luciano Petech, *Western Tibet: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edit.,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Early Indo-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Milan, 1997: 229—255. 本译文的完成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skqx201107）。

的崩溃或外来的入侵,其“帝国”的扩张导致的是快速解体。

所有这些山区王国(唯一的例外是不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的政府形式是严格的君主制,在某些方面甚至保留了古代吐蕃帝国的传统,卫藏模式的神权政体没有发展起来(不丹总是个例外)。

尽管僧人们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他们没有参与管理,通常也没有直接卷入政治。当然,寺院由于其宗教上和经济上的分量使得没人敢轻视他们。再者,特别有才能和受人尊敬的僧侣能够作为精神导师对统治者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西喜马拉雅藏文化区的历史只能部分地从被忘却的记忆中恢复。一般的规律是:政体越小,对其历史知道得越少。只有从拉达克,我们可以知道一点编年史,但是对于15世纪以前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一、象雄与吐蕃帝国

对于西部西藏第一个千年上半段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哪怕是其大体轮廓。第一缕曙光出现于约公元600年,与吐蕃王朝的形成阶段大约同时。西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大的王国,叫作象雄(Zhang zhung),其首府可能位于萨特累季河(Sutlej)的琼隆吾卡尔(Khyung lung dngul mkhar,意译:琼隆银城),其语言显然属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方言。我们知道一些遗留,主要来自相当晚近的词汇。从零散的敦煌文献和编年史中,我们朦胧地知道了象雄的早期历史。据说这个王国最初扩张到了卫藏的西北部甚至北部地区^①。向东的过分扩张不被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象雄等同于汉语中的“羊同”王国这一判定^②,那么汉文文献中也会出现一些曙光。更精确地说,大羊同相当于上部象雄,即古格(Guge)和布让(Purang);小羊同最初则指的是从玛域(Mar yum)到拉孜(Lha rtse)的上部藏布(Tsangpo)河谷地带,后来它被用于指代西北地区,在8世纪下半叶茹(ru, horns)的重组之后,这一地区以“下部”而著称,如东部象雄^③。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的苯教传统中,三个主要的宗教圣地之一位于羌塘南部的达郭山(Stag rgo mountain)和当热湖(Dang ra lake)一带,或许它也曾经是古象雄的一个政治中心^④。无论如何,后来的象雄限于今天的西藏西部地区和一些邻近的山区地带。

与卫藏地区呈上升态势的王国的联系始于7世纪初。当时,大羊同能够于631年和641年向唐廷派遣使者。当象雄王李迷夏(Lig mi rhya)与赞普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的妹妹联姻时,大羊同与吐蕃王室建立了友好的联系。然后,因为对吐蕃王妃的不恭和责难,他们发生了争吵,于是在644/645年,吐蕃赞普打败并废黜了他的小舅子^⑤。汉文文献也告诉我们到开元末年,即649年以前,大羊同已被吐蕃征服和吞并。

安定被征服区域花了很长时间。653年,一名税收官员(mngan)被派驻到象雄,662年和675年再次推行了行政定居点(mkhos)。677年,一场叛乱爆发了,但几乎立刻就被

① Tucci(图齐)1956: 91—92, 104—105。

② Yamaguchi(山口瑞凤)1977: 55—95。

③ Satō 1981: 45—70。

④ Berglie(伯格利)1980: 39—44; Cech 1992: 388。

⑤ 关于征服象雄的时间和情况以及关于古格这个名字作为象雄的一部分而首次出现,参见Uray(乌瑞)1968: 292—297; 1972a: 5—38。

镇压了下去，这次整个王国完全被融入了吐蕃帝国之中。719年，进行了一次付税家庭的人口普查。王国的语言也逐渐融入了藏语，但是，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潜在的非藏语的成分在地名中仍然可以识别出来。

二、西藏西部王国的形成

紧随吐蕃帝国的解体，自相残杀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完全不知道842年之后在象雄西部发生了什么^①，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西藏丧失了对那些边远地区的统辖。

在卫藏地区，就反佛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的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争执。王后那囊妃（Sna nam bza，或帕妃 'Bal bza?）提出由她哥哥三岁的儿子作为候选人，只有强有力的王后支持者才能够迫使大臣们接受，这人就是有名的永丹（Yum brtan）^②。他几乎立刻就遭遇了据称是已逝赞普的遗腹子，由次妃才崩妃（Tshes pong bza）所生^③、诞生于雅砻河谷、名叫斡松（'Od srungs）。这个名字出现在三份敦煌文献中。

在安多，一名来自韦氏（Dba's, Sbas）家族的高级官员起兵反叛并成功打败了当地的藏族头领，但较少反抗汉人。其结果是丧失了中亚和中国西北部的的外属地。在西藏中部地区，冲突继续持续并且没有解决办法。斡松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他的对手占领了卫地及首府拉萨，并且当他母亲在卫地北部地区过世后，他也失去了他的主要支持者。王国实际上被划分成了界限不甚清楚的两部分（朵措 Stod khrom 和麦措 Smad khrom），后藏及雅砻大部分地区追随斡松，而永丹则占据卫地。

斡松的统治似乎持续到大约905年^④，之后是他的独子贝考赞（Dpal 'khor btsan），在位18年，即至约923年^⑤。他的统治是个十足的灾难。后世赞誉他建造了八殿，其中的一个是勉隆（Sman lung）。但是根据DEU/2, 142，他是个邪恶愚蠢的人。他的暴政导致了小邦的不满，一些小邦投奔了永丹的儿子衮觉（Mgon spyod）。混乱无法控制，甚至雅砻河谷的王陵都被盗掘和劫掠了^⑥。贵族们从卫地聚集到一起，推举一名叫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的人掌权，只知道这一点。他可能类似于摄政者（bla mgo dang po）之类。却地（'Phyos,

① 吐蕃对喜马拉雅最西端的控制和行政管理一直维持着，直到君主统治的结束。晚至836年，卓夏（Bru zha，吉尔吉特）的地区性集会仍在发挥着作用。见SNTM, f. 316a。

② 黎吉生否定有永丹这个人的存在，见Richardson（黎吉生）1971: 433—439; 1988: 1221—1229。考虑到我们确凿的最早资料证据，这一理论很难得到支持，见SNTM, DEU/1—2。

③ 我的叙述主要基于DEU/1—2，部分在KPGT有重复。

④ 我们的资料在关于朗达玛继任者的年龄问题上相互抵牾。不必讨论细节，我们大体上就可以分出两种观点：一种是“短寿年表”，在DEU/2, 141—142（斡松活了：45岁，错算成840—881，实际上是840—884年）；KPGT, Ja, ff. 139a-b, 141b（39岁，即846—885年，生年与KPGT中谋杀朗达玛的年代一致，846年）；YLJB, 68，同意这个体系。另一个是萨迦派采用的“长寿年表”，从SNTM和GPGT开始（3岁，应更正为63岁，843—905年）。遵循这一说法的其他年表有NYANG（部分不正确），DEU/1（55岁，847—901年），BTCB（63岁，845—907），DMSM（60岁，应更正为63岁，843—905年）。NEL, 83岁，肯定不正确，但应是遵循了同样的传统。HD和GR1没有给出朗达玛继任者的年代。我姑且接受萨迦派的认定。在Petech（伯戴克）1994: 649—659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

⑤ 几乎一致认为，贝考赞13岁称王，在位18年，31岁逝世。所有这些年代取决于斡松的年表，因此大概在869—883年（NEL）和892—923年（萨迦派）之间。NYANG, ff. 483b和493a，同意萨迦派的观点，但卒年火羊年应更正为铁羊年。

⑥ 萨迦派、NEL、HD和GBYT遵循DEU/1—2，将叛乱和亵渎王陵的时间放在贝考赞时期或其后不久。广为接受的时间分别是土牛年929年和8年后，即937年。另一方面，KPGT, Ja. f. 140a和GR1, 437—438将这些事件放在斡松和永丹时期，分别应该为869年和877年。

在雅砻地区)的头人将王室的徽章以及桑耶寺交付与他,推测可能还有西藏中心东部的大部分尚存地区。这标志着斡松一系在王国古老核心层统治的结束,永丹王朝成为主宰者^①。

贝考赞的两个儿子被迫向西逃。长子为扎西孜巴贝(Bkra shis brtsegs pa dpal),母亲来自钦氏(Mchims),起初在约茹(Gyo ru)和后藏立足,但最后不得不退至后藏西部的拉堆(La stod)。他的三个儿子,“三麦吉德”(Three Smad kyi lde)^②,分割了遗产,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其家族的权力。他们的很多后裔遵循了同样的恶习,将原先的领地又分成许多小的王国。最终他们没落到小地方的头领甚至是地主的层次。这些王国中最重要的是芒域贡塘(Mang yul Gung thang),持续到1619年/1620年。

弟弟赤吉定(Khris kyi lding),更常见的名字是吉德尼玛衮(Skyid lde nyi ma mgon),迁移到了西部,进入古象雄的领地。他只能算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冒险者,追随者并不多。不过,其中有来自两个最显赫家族的后代属卢(Cog ro)和巴察(Pa tshab)。这两个家族在君主统治的最后两任期间曾发挥过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没庐家族('Bro)在古老政权的没落时期几乎曾是最重要的贵族:一名没庐氏的女子是最后两位吐蕃赞普——热巴坚(Ral pa can)和朗达玛的母亲,与汉文文献中名叫尚婢婢的属于同一家族,他领导了反对豪强论恐热(Lun K'ung jo, blon Dba's Khong bzher legs stengs)的斗争,直到他被打败并被迫向西撤退^③。没庐氏与韦氏间的争斗历经了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并延伸到了卫地。没庐氏在贝考赞统治时仍然拥有大相职衔^④。这一家族势力强大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源自羊同,即象雄。他们仍然拥有古格和焦拉(Cog la)的土地^⑤,有可能西藏西部王国的建立即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倡议。他们邀请吉德尼玛衮到他们的地盘去,以给他们的地方权力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⑥。

在这些古老家族的帮助下,吉德尼玛衮逐渐从零开始在西部地区(Stod)建立起了一个幅员广大的王国,即有名的上部阿里(Stod mnga' ris),亦即西部领地。最早的一份历史文献、由阿达·娘饶(Mnga' bdag Nyang ral)于12世纪最后25年编著的史书告诉了我们有关征服的故事。尼玛衮决心为他的三个儿子建立一个家园,于是先派了三名官员前往西部地区去勘察,而他自己则在玛旁雍措湖(the lake Manasarowar)的北边扎营等待他们的报告。“第一名使者访问了布让,一回来他就向王报告,在一个由雪山围绕、像纯色马的肠子(kog pa)的山谷,坐着一个像虫子(srin po 应读作 srin bu)一样的人;去古格的人说,在一个由岩石道路(la g.ya')围绕、像一条纯白色(btang dkar)鱼的肠子的山谷,坐着一个像绵羊一样的人;去玛域(Mar yul, 上部拉达克)的人说,在一个由乡村围绕,像是一条涡旋(ko mog)河流环绕的地方,坐着一个像青蛙(sbal)一样的人。”^⑦

这次探察之后,国王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进入了布让,通过促进商业活动和提供

① 直到这一点,我的叙述遵循的是DEU/1-2。也可参见拙著:Petech(伯戴克)1994: 649-659。

② 意为“三名下部的‘德’”,因为这三个儿子名字中都含有一个“德”字,故名——译注。

③ 《唐书》,P. Pellio(伯希和)译1961: 134-135。原文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2003年,第6105-6106页——译注。韦氏的全名发现于KPGT, f. 140a。

④ GBYT, I, f. 153b。

⑤ KPGT, Ja, f. 20b。

⑥ 斯奈尔格鲁夫最先提出了这一点,见Snellgrove 1987: 471。

⑦ NYANG, f. 493a-b, 感谢格西·格敦塔齐(Dge bshes Dge 'dun mthar phyin)帮助翻译这段相当模糊的段落。

充足的食物供应等主要手段，逐步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以这种方式，他被接受成为布让的统治者，并在那里建立了王法 (*Rgyal khirms*)。在新的领地里，他扩充军队并侵入和征服了古格。然后他率领一百名骑士探险团向玛域进发。从《拉达克史》(*Chronicle of Ladakh*)中我们得以瞥见他的行程。他的行军通过了热拉 (*Ra la*) 山口，并在附近建立了红堡 (*Ra la mkhar dmar*，热拉红堡，地图上的 *Rala jung*；位于印度约东经 79°45'，北纬 32°27')。他在孜托甲日山 (*Rtse tho rgya ri*) 建立了另一座城堡，可能位于拉达克与 *Rupshu* 之间的甲山上。但是，当时他没有触动玛域的领土。如此这般，王法被强制推行至整个上部阿里地区，他在布让建立了尼荣 (*Nyi bzungs*) 城堡 (*sku mkhar*) 作为自己的居处并采用“阿达 (*mnga'bdag*，国王)”的称呼，比老的称呼“赞普” (*btsan po*) 略低；直到 11 世纪末之前，他的继任者们一直沿用这一称号。后来 (?)，随着对玛域的最后吞并，他完成了对阿里的征服，他将王法推行到那里，并判处在那里避难的“罪犯” (即他的对手) 死刑^①。

不管其历史要点是什么，这整个故事都支持我们的看法，即来自卫藏地区的侵入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处置单薄的资源。他通过开发布让的经济资源建立起了一个王国，布让成为尼玛衮和其后继者们的权力中心。这一新喜马拉雅王国相对坚实的结构基础在于其具有以藏族眼光来看的道德上的优势，如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崇高的威望^②。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吉德尼玛衮可能于约 923—950 年在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将征服西部地区的时间放在 10 世纪 30 年代；《拉达克史》认为热拉红堡和孜托甲日建立的马年和羊年，应该是在其征服的早期阶段，可能相当于 934 年和 935 年。

不过这一点也提出了 9 世纪晚期和 10 世纪编年史上的一个尴尬问题。很久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西藏历史的主体部分缺失了至少整整六十年，因此藏文史书的编纂中也缺失了这一部分^③。在这里我们似乎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世系的角度来接近这个问题。尽管支离破碎并且互有抵触，历史似乎都同意斡松和永丹世系传承的数字。阿底峡的两位东道主：沃德 (*'Od lde*, 1042 年) 和波德惹伽 (*Bodherāja*, 约 1047 年) 属于朗达玛之后的第七代。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斡松和永丹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都被宣称为王这一事实，他们的统治使得世系的传承变得混乱。因此在 200 年内传承七代就有可能，那么这里提出的传承 (从此处也可以推断出年表) 顺序似乎也可以被全盘接受。

吉德尼玛衮与其主要支持者属卢和巴察家的女儿结婚。王国建立后，他又缔结了两次婚姻，与一名象雄女子和一名大食女子 (*Stag gzigs ma*)，后者是一名波斯或阿拉伯的女子。他的第一位妻子属卢·象卡玛 (*Cog ro Zhang kha ma*) (LDGR 中记载的是没庐氏) 育有三子，一起被称为“三堆吉衮” (*Three Stod kyi mgon*)^④。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将王国进行了划分，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根据大多数的资料记载，长子贝吉德·日巴衮 (*Dpal*

① 尼玛衮征服西藏西部的记载主要是基于 NYANG, ff. 493a—495b，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实。

② 阿底峡的传记也确认阿里主要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了拥护。

③ 伯戴克首先提出这个问题，Petech 1939: 44，紧接着是图齐的一个说明，Tucci 1941b: 281—285。然后是罗列赫 (G.N. Roerich) 和黎吉生的详细讨论，见罗列赫《青史》(*The Blue Annals*) 导言, xvii-xviii 和 H. Richardson (黎吉生) 1957: 57—58。这一问题仍然还远未解决，并且引起尚存于安多和复兴于卫藏的宁玛派的历史中无法克服的矛盾。

④ 意为“三名上部的‘衮’”，因为这三个儿子名字中都含有一个“衮”字，故名——译注。吉德尼玛衮的后代谱系几乎在任何一本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书中都可以找到，他们都采用相同的名字。图齐 1956 年制作了一个方便的图表，现在可以把其它的名字加上去了。

gyi lde Rig pa mgon) (通常简称贝吉衮, Dpal gyi mgon) 占据玛域, 二子扎西衮 (Bkra shis mgon) 得到布让, 三子德祖衮 (Lde gtsug mgon) 获得古格或象雄。我们应该记得, 这一时期之后, 古老的名字象雄已经萎缩到等同于古格, 尽管古格最初只是象雄的一部分; 后来这两个名字几乎成了同义词^①。第三子得到的领地的名字在史书中的记载是不同的: 一些文献说给了他库布 (Khu bu, Kinnaur 金瑙尔), “是门 (Mon) 地的一部分”^②, 而《拉达克史》则认为桑噶 (Zangskar) 和斯比蒂 (Spiti)^③。另一部权威文献给出了一个更为详细和有点分歧的观点: 长子占据玛域和努热拉 (Nub Ral la); 第二子得到象雄和吉焦 (Ci cog) (即 Spi lcog, 比焦), 尼贡 (Snyi gong?) 和日土 (Ru thog), 布让 (Spu rangs) 和玛措 (Ma tsho?), 共六个地区; 第三子不得不满足于噶尔夏 (Gar zha, Lahul 拉胡尔) 和桑噶^④。这三个新的王国一起以“阿里三围” (Mnga' ris skor gsum) 而著称。不过第二子和第三子的领土很快就被兼并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没有男性继承人。

三、早期的布让王

作为一个可行的假设, 我们或许可以将第一位王扎西衮的在位时间断为约 950—975 年。布让, 以古格作为其附属, 构成了王国的核心, 还包括玛域, 一直持续到 11 世纪晚期。尽管自图齐 1933 年的先驱性研究之后, 我们已经习惯于称呼这个王国为古格, 但是头脑里必须清楚, 在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其政治中心是布让而不是古格。

在这一点上, 我们或许可以介绍一条来自最早资料的证据, 是由萨迦派高僧索南孜摩 (Bsod nams rtse mo, 1142—1182) 于 1167 年编著的《佛法入门》^⑤。作者不仅用十二纪年法来界定年代, 并且用计算佛涅槃后的年数来纪年, 根据他的年代算法大致也是萨迦派的算法, 一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2133 年。SNTM 的这一段, 还有后面会引用的两段, 被复制进了萨迦班钦 (Sa skya pañ chen, 1182—1251) 所著的杰尊·札巴坚赞 (Rje btsun Grags pa rgyal mtshan) 的传记: “所有西方和东方的父兄们 (yab mched) 在焦拉 (Cog la) 地区的白卡 (Speg mkhar) 会面。”^⑥在这次会议上,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 (或举行了一场大的

① Tucci 1956: 74—75。

② NEL, 68; GPGT, f. 199b; NYANG, f. 499a, 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且不可靠的分配。

③ LDGR, 35.13—18。在 KT 1745, 73, 这些名字变成了 Pi ti lcog 和 Zangs dkar sgo gsum。

④ GBYT, I, f. 154a。关于比焦, 参见本页注释⑥。

⑤ 索南孜摩保存了一些可以追溯到君主制时期至其灭亡后的那个世纪的材料。见 Szerb 1983: 380—382。

⑥ Cog la 和 Lcog la 指的喜马拉雅同一地区的两个不同地点: 一个是古焦 (Gug lcog) (即古格焦拉, Guge lcog la), 一个是比焦 (Spi lcog) (即比蒂焦拉, Spi ti lcog la)。古焦在敦煌文献中已经出现, 与象雄有关。它于 674 年反抗吐蕃, 三年后, 他的国王仁祖果 (Rin tsug skor) 卷入了整个象雄的叛乱。在 KPGT, Ja, f. 20a 中, 古格 (Gug ge) 和焦拉 (Lcog la) 被包括在下部象雄里。同一文献的另一段 (f. 20b) 提到了 5 个古焦 (Gug cog) 的地区 (sde)。斯比蒂拉隆寺 (Lalung) 未出版的一则长长的题记中两次提到古焦 (Gug lcog) 属地 (阿里, Mnga' ris)。因此这个特别的焦拉在古格的附近。如果焦拉的白卡等同于图齐和杰西文中的白卡 (Bekhar), 见 Tucci & Ghersi 1934: 369, 调查地图上的比尔 (Biar), 那么古焦就位于古格的西部, 沿着萨特累季河向下。另一方面, 比焦似乎是拉隆寺题记同一段中的比德焦拉 (Spi sde lcog la), 这证明两个焦拉是截然不同的。济焦 (Spyil cog, 有时也写作 Spyi lcog) 的脱噶格则 (Tho gar dge mdzes) 是丹珠尔中一篇短文的译者 (T. 2146)。LDGR, 15.18 中比蒂和比焦一起提到。NYANG, f. 500b, 提到比焦塔波 (Pil cog rta po)。最后, 塔波杜康殿墙壁上一则题记中的焦拉之德 (lcog la'i sde) 显然指的是比蒂焦拉 (Spi ti lcog la)。即使今天,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焦拉三地 (Lcog la yul gsum) 包括斯比蒂河的三个村子 (yul), 即布 (Spog, po)、塔波 (Tabo) 和拉日 (Lari)。

讨论)。修缮了茹地 (Rum) ①巴 (萨) 干 [pa (sa) sgam] 的修行地。计算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 是在公元 992 年 ②。

整个段落的意思胶着于词汇 *yab mched bying(s)*, 字面意思是“所有的父亲和兄弟”。我们可以从属于同一教派的一个文献中举出一个类似的集合词汇进行比较, 谈的是稍早的一段时期: “贝考赞的两个儿子划分 (他们的领土) 成二 (部分), 西部和东部。六位 *yab mched* 又缩减成小部分” ③。这里的“六位 *yab mched*”指的是“三堆吉衮”, 吉德尼玛衮的儿子们加上“三麦吉德”, 扎西孜巴贝的儿子们。因此, 我认为我们可以理解 *yab mched* 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王室成员”。接下来我们的文本提到了贝考赞第三代后裔们的一个家族会议, 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最后界定他们各自的领地。巴干或萨干修行处的建立或修缮暗示着开始重视对发生在卫藏的、被朗达玛破坏的寺院秩序的恢复。

扎西衮 ④和他的妻子巴察妃 (Pa tshab bza') 有两个儿子, 名叫 (赤贝 Khri dpal) 柯热 ('Khor re) 和 (赤贝) 松额 (Srong nge)。前者 (或后者, 在这一点上不确定) 成为了布让王 ⑤, 结婚并育有二子, 在我们所有的资料中都有着梵文名字那嘎惹伽 (Nāgarāja) 和德瓦惹伽 (Devarāja)。显然, 他在位的时间不长 (约 975—985 年?), 因为在他的下半生, 他逊位给他弟弟, 受戒成为一名僧人。从此以后, 他以法名益西沃 (Ye shes 'od) 而著称 ⑥。

这个故事表明, 在那个遥远的古老吐蕃帝国的角落, 佛教并未消亡, 至于它是怎样的佛教, 则是另一个问题。《俄尔史》(*Ngor Chronicle*) 描绘了一幅当时佛教的凄凉画面: “朗达玛被害后, 至此时 (即松额和柯热的时候), 一些世俗信徒只注重真言道 (The Path of the *Dharani*) ……国王死后, 他的每一位儿子和学生并未完全遵循王法。随着 (王国的) 逐步解体, 宗教的修行与苯教混在一起, (佛教徒) 修习吟修 (*gyer sgom*) (一种宁玛派和苯教的修行) ……寺庙僧众穿着破旧的长袍, 依旧听任自己被叫作罗汉 (*sthāvira* 和 *arhat*)。假装遵守戒律, 他们实际上只遵守三个或四个月夏安居期间的很短一段时间。以精神障碍为借口, 他们变得更为邪恶。生起菩提心 (*cittotpāda*) 和灌顶 (initiation) 这些词语已经消失。” ⑦

面对这种情况, 这名王室喇嘛为自己定下生活目标, 复兴真正的佛教, 建立新的宗教组织。益西沃不仅成为重新引进佛教的推动力, 而且总体上监督宗教事务和寺院建设。他

① 茹 (Rum, Tum) 这一地名已经出现在米兰一份 9 世纪的文献中, 见 Thomas (托马斯) 1951: 149, 1.17。在塔波寺, 它在杜康殿墙壁上的题记中出现过一次, 在郭康殿的墙上又出现了一次, 据称茹是属于古格地区。

② 见括号中的不同拼写: chu pho 'brug gi lo la Cog la yul (加 gyi) sPeg (sBeg) mkhar du sTod sMad kyi yab mched bying (省略) gdan 'dzom pa'i dus su mol ba chen po mdzad/Rum (Tum) yul Pa (Sa) sgam gyi dben sa gsar du btsugs pa'i dus su brtsis na/lo 3125。见 SNTM, f. 316a-b; SKP, f. 297b。

③ Dpal 'khor sras gnyis stod smad gnyis su gyes/ yab mched drug gis rgyal sa khol bur bzung。见 GPGT, f.199a; NEL, 84。

④ 或德祖衮 (Lde gtsug mgon), 据 BTCB, GR1, YLJB, KPGT, DMSM。

⑤ DEU/1, 368, 381, DEU/2, 141, 146 给了他一个听起来像法名的名字沃德坚赞 ('Od lde rgyal mtshan), PAKP, f. 147b 理解为柯热 ('Khor re) 和拉德 (Lha lde) 之间的另一个国王,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⑥ 一些早期的文献将益西沃等同于柯热, 如阿底峡传记, DEU/1-2, NYANG, HD, BA。从 SNTM 开始的大多数史料中, 是松额成为了益西沃。印刷版的 BTCB 遵循了第一种说法, 而同一著作的两个写本遵循的是第二种说法, 见 Szerb 1990: 64, n.4。至于益西沃的可能年代, 见下文。

⑦ NGCB, f. 126a。斯奈尔格鲁夫认为吉德尼玛衮在老象雄建立的宗教是低劣的, 混合了佛教的流行形式, 见 Snellgrove 1987: 473。

因此开创了一个被后世沿用的习俗,并被每一位国王的弟弟(们)所遵循。

他的建设活动被碑铭所证实。有名的纪念斯比蒂塔波寺整修的题记告诉我们“先辈菩萨”(即天喇嘛益西沃 *lha bla ma Ye shes 'od*)于猴年建立了寺院(祖拉康),也就是约996年。这也是当地传统接受的年代。金瑙尔普(*Spu, Poo*)附近一件石碑上磨损一半的题记好像也提到了一座由天喇嘛益西沃所建的寺庙建筑(已不存)^①。

这位新国王(约985年—1000年)也是一名建设者。如果他是柯热,他在科迦(*Kha char, Khojarnath*)建立了一座殿(拉康),在噶尔冬(*Skar dung, Kardam*)建造了一座城堡,都在布让。在他生命的末期,他也受了戒,以噶尔冬世界法王(‘*Dzam gling Chos rje of Skar dung*)作为他的喇嘛^②。

两名王室兄弟召集了两名来自克什米尔的佛教学者,但是初次的尝试即因语言难关而失败,因为没有经过训练的译师^③。于是,根据许多文献的叙述,为了为宗教的复兴奠定学术的基础,益西沃选取了21名青年,为他们提供丰厚的财富,将他们派往克什米尔去接受培训,成为专业的译师(*Lotsawa*)。然而,在难熬的气候中只有两名活了下来,其中的一名是古格的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

这将我们带到了西藏西部佛教复兴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跟前。我们的主要资料是他的传记,据称作者是他的直系弟子之一,但编制时间则可能晚得多,在14世纪或15世纪早期。根据这份文献,他出生于958年,98岁圆寂(按西藏的方式计算),即1055年。所有的晚期文献无一例外地都沿用了这一年代。但是,我们将这些年代放进根据其他资料重新构建的西藏西部历史的框架中去时感到相当不舒服。

一些基本要点的叙述也与一般的说法不同。它告诉我们,仁钦桑布13岁出家,17岁时是自己主动离开家乡,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仅有一名侍从陪伴,只带了600个海贝作为旅资,关于王室的赞助,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的出发年代断为猪年,975年^④,这些没有得到益西沃的支持,他出家为僧是在7年后。

这位来自古格的年轻人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学习过程,最先在克什米尔师从班智达信作钁(*Śraddhākaravarman*),然后在印度北部,师从其他几位学者学习。13年后他回到家乡,应该是988年^⑤。其后几年他在他的故乡古格,没有动静(或活动有限)。

这整个的叙述,包括年代,似乎相当奇怪。我怀疑传记将他生平早期的所有事件,包括出生,都提早了12年。987年和1000年应该与历史框架更吻合,但是没有一丁点儿证据能够支持这些假设的年代。

仁钦桑布生平的转折点是他前往布让的王都,当时,松额(或柯热)的位置已经被他

① 塔波寺的题记首次由图齐公布,见 Tucci 1935: 195—198。关于普的题记,见本文第144页注释⑦。

② 至于柯热建立科迦拉康,参见 SNTM, f. 341b, GR1, 456。《科迦寺导读》(*Guide to khojarnath*)第41页记载,柯热不仅建立了科迦寺,并且建立了噶尔冬城堡。

③ GBYT, I, f. 156b; NYANG, ff. 498b—499a。

④ RCZP: 87。对这位西藏西部佛教改革家的研究最全面的仍是图齐, Tucci 1933。(关于这位大译师的生平传记,参见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刊于《中国藏学》2013年4期和2014年1期——译注)

⑤ 传记认为他第一次去克什米尔停留了七年,之后,我们读到去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整个旅程持续了13年。不过,这两者不应该加起来,因为他在克什米尔的第二次停留很短,只是为了重获他托管在那里的书,因此,13年应该包括第一次在克什米尔停留的7年。根据 PAKP, f. 176a, 仁钦桑布33岁时回到西藏,这也支持上面提出的年代。

的儿子拉德 (Lha lde, 约 1000 年—1025 年) 继承^①。这位国王和他的伯父益西沃认识到他们找到了一名羽翼丰满的学者——仁钦桑布, 足以胜任翻译和组建的任务。他们向他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奉他为顶上福田 (*dbu'i mchod gnas*), 暗指其凌驾于其他佛教信众之上。

受到官方权威的支持, 仁钦桑布开始了广泛的建设活动, 在布让和更远的南部地区, 远至金瑙尔下部, 广建寺庙 (*lha khang*)。根据传记, 他发下誓言 (*zhal bzhes*) 建立 108 座寺庙, 这是一个传统上的神圣数字。这一时期杰出的建筑是他受雇于国王拉德, 作为首席主管, 负责布让国之圣殿——科迦寺主殿 (*gtsug lag khang*) 的创建。益西沃同样建立了古格的主要寺院——托林寺。最后, 仁钦桑布去了玛域 (拉达克), 建立了聂玛寺 (Nyar ma), 尽管今天已成废墟, 但早期曾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中心。简而言之, 他帮助了阿里三围 3 座主要寺庙的创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王家寺院托林寺, 现在已遭到很大破坏, 唯一尚存的部分是杜康殿和白殿, 杜康殿的壁画还在, 但塑像已佚^②, 现存的这两座殿堂都是后期建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该寺是西藏西部最伟大的寺院建筑群。

有可能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活动过程中, 仁钦桑布已经 49 岁了 (即 1003 年), 终于从班智达沃色桑布 ('Od zer bzang po, Candrabhadra)、Bhinase? 和 Kamalarakṣita 获授比丘戒 (*bsnyen rdzogs*)^③。在仪式之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国王派遣他开始第二次印度之旅, 这次限定于克什米尔地区。他的任务是去获取宗教经典和一批艺术家 (*lha bzo pa*) 和工匠, 装饰新建的寺庙和佛殿。关于这次出发的时间, 不可能确定一个哪怕是大概的年代。作为一个纯粹的推测, 我认为是大约 1010—1015 年, 他的最后一次克什米尔之行持续了六年。

他返回之后, 可以注意到在译师的艺术活动中, 印度的影响急剧上升, 主要归功于他的克什米尔合作者^④。他的传记包括一个有趣的他在“小地方” (*yul chung*) 建立的 21 处殿堂目录^⑤, 其中一些是建于国王赐予译师和他四名首席弟子的领地或村子里。这些殿堂中, 除了 5 座以外, 其余的图齐都辨认了其实际所在地, 但许多已经不存了, 或仅有废墟留下^⑥, 它们分布在有限的区域内, 包括古格、斯比蒂和上部金瑙尔。只有两座建筑在这个区域之外, 一座是布让的谢萨 (Zher sa 或 Zher wer 谢韦尔), 是国王赠给仁钦桑布的主要领地。带着几分怀疑, 我认为谢尔 (Zher) 是地图上的夏尔 (Shar), 位于卡那利河 (Karnali, 孔雀河) 科迦寺下去大约 8 公里处。另一座是雪林 (Zho ling), 即拉胡的觉林 (Johling)^⑦。

这个目录里也包括塔波寺, 关于仁钦桑布和这座有名的寺院之间的联系还需要讨论。

① 根据跋记, 全名是赤扎西·阿达·拉德赞 (Khri bkra shis mnga' bdag Lha lde btsan)。在 DEU/1, 381 和 DEU/2, 147 中, 这是松额的官方名字。在 11 世纪的布让王中, 这种署名方式很常见, 如同在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各种跋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完全王室风格的名字是贝拉赞普 (Dpal lha btsan po)·赤扎西·阿达·德赞。参见图齐书中的一些例子, Tucci 1933: 24n 和 50—51。

② 图齐的传记写本 f. 29b, 明确地把托林寺的创建归于益西沃和他的两个儿子, 由仁钦桑布经办。SNTM, f. 314a, 将该寺的创建只归于益西沃。NYANG, f. 500b, 脉络相同但是有更多的细节, 将科迦寺祖拉康、塔波寺、聂玛寺、普日香木林 (Shamgling in Pu rigs, 一个相当孤立的信息条目) 和古格的托林寺都归于益西沃。该寺建成于他派遣仁钦桑布和 21 名年轻人去克什米尔留学之前。关于托林寺目前的现状, 参见 Tanaka (田中) 1994: 863—872。

③ 这条信息仅发现于 PAKP, f. 178b; 传记没有提到这个内容。

④ NYANG, f. 501a 称呼仁钦桑布为“来自象雄的塑像者” (Zhang zhung gi lha bzo)。

⑤ Snellgrove and Skorupski (斯奈尔格鲁夫和斯科若夫斯基) 1980: 95。

⑥ Tucci (图齐) 1933: 71—72; Tucci (图齐) 1935: 11—14; Tucci and Ghersi (图齐和杰西) 1934, 索引。

⑦ 雪林被认为是拉胡地区格木 (Gemur) 附近的觉林, 见 Klimburg-Salter (金伯格) 1994a: 47—49。

如同前面注意到的,塔波寺是由益西沃于996年创建,仁钦桑布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修复题记中,也没有出现在郭康(*sgo khang*)墙壁上绘制的大约30名僧人中,这些僧人根据题记可以辨识其身份。根据金伯格教授建立的壁面装饰的风格顺序^①,郭康的壁画表现的是寺院最古老的部分,没有任何克什米尔影响的痕迹,几乎不可能是译师带来的画家创作的。这似乎排除了仁钦桑布参与创建最早期的建筑的可能性,并且可以推断出他的“创建”是杜康的部分重建以及壁画第二个时期的创作(伟大的金刚界曼荼罗),有着强烈的克什米尔影响。

此外,仁钦桑布第三次和最后一次克什米尔之行同样重要的结果是翻译活动的大量增加。当时,基本的观念是,纯粹的宗教只能是基于印度佛经和哲学文献的直接知识。仁钦桑布与印度大师合作,勤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老上师信作铠,被邀请到了古格^②。他的成果真的了不起,有他的翻译目录可以为证^③。由于益西沃和仁钦桑布的努力,西藏西部成为了主要中心,一种新的佛教从这里向藏语地区传播。

属于这一时期的一条有点令人费解的信息,又是由索南孜摩提供的。文本保存得相当差,但是萨迦班智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进行了复制,这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好的读本。

“天喇嘛益西沃和他的儿子们在巴干(萨干)强宁林 [Pa (sa) sgam Byams snyoms gling] 修行处碰面。年幼的王子拉柯(Lha 'khor)获授戒。(关于)在古格地区的定居,象雄年长的(王子)推行了一种普遍的定居点^④,计算(这件事的)时间是公元1016年”^⑤。

该文本的历史意义不甚清楚。年幼的和年长的王子应该是那嘎惹伽和德瓦惹伽。名字拉柯可能指的是那嘎惹伽。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古格本土及其中心托林寺可能是作为由益西沃及其儿子们统治的一种宗教领地或封建权威。在这种情况下,由他的长子正式建立了对它的管理。一份晚期的资料似乎提及了这样一种划分:据说松额(在这里是益西沃)得到古格,而布让被分配给柯热^⑥。这可能也与塔波寺郭康南壁绘制的这父子三人的形象有关,其身份可根据每尊人物下方的题记得到断定。我们也很有意思地注意到,在上面提到的21个殿堂目录中,好像几乎正好覆盖了古格的宗教领地所在区域。后者还包括普,那里有一则破坏严重的题记似乎也属于这一时期,是由神子××××惹扎(*lha sras* ××××*radza*)所建,即可能是那嘎惹伽。它的年代为龙年,我认为可能相当于1024年^⑦。

关于1016年实施的定居点,没有进一步的信息,那嘎惹伽和德瓦惹伽也被遗忘了。他们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有关他父亲被关押以及尽力救赎的事件中。阿底峡传记中顺带提

① Klimburg-Salter (金伯格) 1985: 11-41; 1994a: 32-38。

② SNTM, f. 314a。

③ Tucci (图齐) 1933: 40-45。

④ 我认为'*Khos*'这个词与敦煌文献中和KPGT中的*mkhos*意思相同,即“定居点,行政管理结构的最小单元”,参见乌瑞的讨论, Uray 1972b: 18-20。

⑤ 括号中为不同的拼写: *me pho 'brug gi lo la lha bla ma Ye shes 'od* (省略了 *Ye shes 'od*) *yab sras dben gnas Pa (sa) sgam Byams snyoms gling du gdan (zhal) 'dzom mo* (省略) / *lha sras gcung Lha 'khor rab tu gshegs ('byung) / Gu ge 'i yul na gnas pa 'i 'bangs Zhang zhung zhig* (省略) *gis (gi) gcen (chen) gyi 'khos chen po mdzad pa 'i dus su brtsis pa na / Sangs rgyas mya ngan las 'das pas* (省略 *Sangs ... pas*) *lo 3149 lon te* (SNTM, f. 316a; SKP, f. 297b)。从萨迦班智达开始,这个文本变成了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bgrod pa gcig pa 'i lam chen gsung ngag rin po che 'i bla ma brgyud pa rnam thar*, f. 27b。

⑥ KT 1745, 73。

⑦ Thakur (塔库尔) 1994: 369-375。我对这则题记的解读不同于塔库尔。

到他们在约 1046 年时仍然活着，当时，这名印度大师在桑耶寺（*Bsam yas*）附近的钦浦（*Mchims phu*）。他们试图从他获授大梵天（*bram ze chen po*）的箴言，但是被仲敦（*'Brom ston*）阻挠了^①。

在拉德统治期间，王国染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即使陪伴吉德尼玛袞去西部的古老的贵族家族也参与了王室发起的工作。我们在译师中发现了一个属卢和一个巴察的名字^②，没庐氏家族拥有拉达克的领地，在那里建立了阿契寺，因其精美的壁画而广为人知。

拉德的位置由其长子沃德（*'Od lde*，约 1025—1060 年）继承。鼠年，他生命中的第 13 年（可能是 1036 年），国王亲自去了拉达克，在仁钦桑布的指点下，他建立了贝图（*Dpe thub, Spituk*）寺^③，他的弟弟颇章·喜瓦沃（*Pho brang Zhi ba 'od*）成为了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名译师。他在托林寺开展了相当规模的活动，资助翻译事业并亲自参与了一部分。第三子，起初名叫扎西沃（*Bkra shis 'od*）^④，受戒后名叫天喇嘛绛曲沃（*lha bla ma Byang chub 'od*）。他追随了其叔祖益西沃的脚步，成为古格寺院建筑的首领。

天喇嘛益西沃仍然在世，他逝世的细节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许多文献中有着不同记述。他为了迎请一名印度班智达，率军远征，去搜集必需的黄金，但是在印度边境遇到了伏击，被一名非佛教徒关入狱中，有些文献中称之为噶逻（*Gar log*）。他们的头领让他选择，放弃宗教信仰或者支付与他身体等重的赎金。他的侄孙绛曲沃努力搜集黄金，甚至去到了遥远的卫地和藏地，但是搜集到的仍然少于所要求的数量。益西沃告诉他的侄子，因为他已是一名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且正被捕获者严厉处置，因此最好用这些黄金去迎请杰出的印度大师。（绛曲沃）遵从了他的意愿，尽管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可以推测他逝世于狱中^⑤。

但是，这个故事与仁钦桑布传记的记载不一致，根据传记，益西沃病逝于他的寺院托林寺。仁钦桑布未能在他临终之时及时赶到，于是主持了葬仪^⑥。因此这一教化性叙事的历史真实性值得怀疑。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推断益西沃的逝世年代。各种版本的文献都记载，这名老人热衷于邀请一位著名的班智达。为达成他最后的愿望，1037 年，一个使团被派往印度去邀请阿底峡^⑦。这样我们可以将益西沃的生病定在此前的一年或两年。有一个文献确认了这种计算。它告诉我们益西沃只比仁钦桑布年轻一岁，他出生于一个鸟年，活了 78 岁^⑧，这就将他的

① Eimer (艾米尔) 1979: 252, no. 304。

② GBYT, I, f. 159b。

③ VS, f. 224a。

④ 这个名字只发现于《阿里教法史》（*Mnga'ris chos 'byung*），在 HD 中被引用，n. 249。

⑤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红史》中，其他所有的早期文献中都缺失。GBYT, I, f. 156b 明确叙述益西沃逝世于蛮荒边境地区（*mtha' khob*）；KPGT, II, 292 说他被噶逻人杀死；YLJB, 91 有一个孤立的记述：喇嘛在印度边境被索波（*Sog po*）军队被投入狱中，但在该书第 41 页中又称呼捕获者名叫噶逻王。斯奈尔格鲁夫提出了这一故事的传说特点，见 Snellgrove 1987: 480。关于噶逻问题，参见附录 A。

⑥ RCZP, 92。

⑦ 关于其年代，参见维大利著作中引用的文献，见 Vitali (维大利) 1990: 67, n. 121。

⑧ 在 KT 1745, 74 中引用了《阿里贡塘史》（*Mnga'ris Gung thang lo rgyus*）。同样的著作在 KT 1745, 71 和 KT 1748, 145 中也有引用。它的作者是贡塘·阿达诺布德（*Mnga'bdag Nor bu lde*，生于 1450 年）。这个资料告诉我们那嘎惹伽受戒后叫绛曲沃，德瓦惹伽是喜瓦沃（KT 1745, 74）。当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生卒年定为 959—1036 年^①。尽管年代较晚并且证据孤立,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驳斥这条证据。

不管益西沃是如何逝世的,它没有延缓王室的建设活动。绛曲沃追随其叔祖的传统,在他的资助和仁钦桑布的监管下,又建立了几座新的寺院。它们是布让的察巴岗寺(Tsha ba sgang)和古格的芒囊寺(Mang nang)。塔波寺题记告诉我们绛曲沃在益西沃建寺 46 年之后修缮了寺院,如果我们接受 996 年是其创建时间,那么就是在 1042 年进行了修缮,正好也是阿底峡抵达的年份,或许两者之间有联系。

沃德和绛曲沃对阿底峡的邀请是西藏宗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目的首先是宗教的^②,但是我们推测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仁钦桑布的年龄,现在已经年老体弱以及两名王室兄弟希望其活动变得冠冕堂皇的愿望,于是他们选择了吉祥燃灯智(Dīpaṃkaraśrījñāna),通常称阿底峡(Atiśa, 982—1054 年),东印度超戒寺(Vikramaśilā)的著名祖师。经过长时间的拒绝之后,他接受了召请,通过尼泊尔去了布让,在王国停留了三年(1042—1045 年),是王室尊贵的客人。年老的仁钦桑布,尽管受到这名印度大师有点傲慢的对待,但仍然与他合作译事。然后他退居修行,1055 年 98 岁逝世(对我们而言是 97 岁)^③。

至此,藏西完成了与新的佛教的对话,显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是,传统上认为象雄是苯教的摇篮,遇到苯教的一些反对也是预料之中。在我们的资料中或许有一个暗示。据说仁钦桑布战胜了(btul)鲁·噶色(Klu Skar gsal)并且通过宗教辩论驳斥了不正确的密教修行^④。有人提出,鲁·噶色可能就是辛钦·鲁噶(Gshen chen Klu dga', 996—1035 年),他在止察塔噶('Grig mtshams mtha' dkar)重新发现了苯教阿毗达摩文献(Abhidharma, Srid pa'i mdzod phug)(1017 年),标志着苯教后弘期的开始^⑤。一位早期的苯教大师竹·琼吉坚赞(Bru Khyung gyi rgyal mtshan),据说是被布让、香(Shangs)和色日(Se rib)的国王们从后藏召请而来。1262 年,苯教徒布钦·楚臣坚赞(Bur chen Tshul khriṃs rgyal mtshan)被他的老师派往西部的几个地区,其中包括布让;他从布让和羌(Byang)获得了 133 名学生^⑥。晚至 15 世纪,帕木竹(Phag mo gru)的金阿·索南坚赞(Spyan sng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86—1434 年)排挤了噶杜巴(Dkar gdum pa)——一名生活在布让的苯教大师,

① 意大利学者维大利根据古格堪钦·阿旺扎巴所著的《阿里王统记》,推断益西沃的生卒年为 947—1024 年,广为藏学界所接受,见 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According to mNga'ris rgyal.rabs by Gu.ge mkhan.chen Ngag.dbang grags.pa*, New Delhi, 1999, pp. 51, 107—108, 171—185。美国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通过对早至 12 世纪的几份藏文文献中关于阿里王统的记载的考察,认为益西沃的生卒年为 947—1019/24 年,见 Leonard W.J. van der Kuijp, *A Fifteenth Century Biography of Lha bla ma Ye shes 'od (947—1019/24): Part One: The Early Years up to his Ordination as a Monk*, 待刊文。——译注

② NEL 153 提供了一传统观点的论证。

③ RCZP 的结尾含有一个年代上错误。据说阿底峡听说了发生在译师圆寂仪式上发生的奇闻轶事。事实上,阿底峡比仁钦桑布还早逝世一年。

④ 参见 Szerb 的评论版, Szerb 1990: 87—88 (f. 153)。这段在 BTCB, 214 中被误译,因此 Tucci (图齐) 1933: 67 犯同样的错误。那伽(龙)噶色在藏西经常被描绘为女魔,被仁钦桑布改变了她的宗教信仰,见 Tucci & Ghersi (图齐和杰西) 1934: 339 和 Tucci (图齐) 1936: 168。

⑤ Simth (史密斯) 1970: 6, n. 13。这个止察('Grig mtshams)或直察塔噶('Bri mtshams mtha' dkar)作为伏藏发现地在《格言宝藏》(Legs bshad gter mdzod)中被提到,见 Karmay (噶尔美) 1972: 129。它与位于郭域(Sgos yul)的直察('Bri mtshams),即后藏曲比(Chumbi)谷口地区,不一样,见 Tucci (图齐) 1941a: 67。

⑥ 参见 Jackson (杰克逊) 1978: 201 和 206—207。

当时他正在侵扰隐修者^①。这意味着直到那时，苯教在藏西仍有追随者。但是 15 世纪之后，直至今日，在阿里三围没有有组织的苯教团体存在；苯教在康区和藏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势力。

阿底峡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为藏传佛教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他在一部名叫《菩提道灯论》(*Bodhipathapradīpa*) 的小书中总结了她的观点。该书是在托林寺为绛曲沃而作的。他强烈主张无异议地学习印度文献，遵守寺院戒律，但是，要审慎使用前两级的密教瑜伽。然而他在古格停留期间，不允许他翻译密教文献^②。

密教大量出现于西藏西部王国的宗教生活中并不是没有政治背景的。大约同时期的卫藏地区呈现的是宁玛派强势复兴的场景，也就是吐蕃时期最后几十年盛行的佛教。老的寺院秩序和建筑被朗达玛破坏后^③，一些信徒避难去了安多，10 世纪下半叶，他们又从这里回到了卫藏地区的舞台。仲敦计算的宁玛派复兴开始的年代是 978 年，但其真正的开始是第一座寺院的建立：后藏的坚贡寺 (Rgyan gong, 997 年) 和卫地的莫热杰寺 (Mo ra 'gyel, 1009 年)。在 11 世纪的第一个 25 年里，由于永丹一些后裔，即卫地的赤德衮赞 (Khri lde mgon btsan) 和桑耶的扎那·益西坚赞 (Tsha na Ye shes rgyal mtshan) 的资助，密教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④。

与古格同时，在桑耶也开始了翻译活动。扎那·益西坚赞也称为阿达·拉·益西坚赞 (*mnga' bdag Lha Ye shes rgyal mtshan*)，也参与翻译工作，与印度大师莲花密 (*Kamalaguhya*) 合作，翻译了《金刚心庄严》(*Vajrahṛdayālamkāra*) 以及一组小文献，现收入丹珠尔中^⑤。永丹一系与古格诸王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的竞争始于不同的基础。

布让之外，斡松一支的其他成员遵循同样的潮流。“三麦吉德”，即益西沃的堂兄弟们统治拉孜 (Lha rtse) 地区，引进了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新密 (*sngags gsar ma*)，相对于大部分西藏起源的旧密 (*sngags rnying ma*) 而言。为了在他们的领地内恢复佛教，他们求助于洛顿·多吉旺秋 (Lo ston Rdo rje dbang phyug)。他是宁玛派复兴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坚贡寺的创建者，他向他们派遣了两名他的弟子。他们在仁钦桑布近 50 岁时开始他们的宗教活动，即 1007 年或之前不久。再晚些时候，两名老师派遣了卓弥 ('Brog mi) 和达洛·熏奴尊珠 (Stag lo Gzhon nu brtson 'grus) 去印度学习，没过多久，卓弥将新密引进了西藏^⑥。

布让诸王对于密教不仅在卫藏地区，而且在他们自己领地内的日益流行表示怀疑。事实上，正如《俄尔史》里简洁地提到，“不知道密教的理论，只从字面上断章取义，(佛教

① BA, 594.

② 关于阿底峡在西藏西部发挥的作用，一个中和的观点参见 Snellgrove (斯奈尔格鲁夫) 1987: 480—485。

③ 关于朗达玛“迫害”的真正含义，参见噶尔美的评论，见 Karmay (噶尔美) 1988: 77—78。这一历史事实遭到山口的彻底否认，见 Yamaguchi (山口瑞凤) 1995。

④ 维大利提供了这些事件的一个概要，见 Vitali 1990: 37。卫藏第一座新的寺院坚贡寺的年代，维大利讨论过，见 Vitali 1990: 91—92。我们可以加上 DEU/2, 158 的观点，宁玛巴返回到卫藏发生在 969 年。关于这两名赞助人，参见如 BZH, 87; NYANG, ff. 495b—496a; HD, 41; DMSM, 170—172。另一个赞助人是察[拉]那 (Tsha [-la] na) 的儿子赞普 (*btsan po*) 赤 (Khri 或赤巴 Khri pa)。

⑤ T. 451; 1303, 1846, 1850, 1853, 1859, 1866, 1870, 1872—1878。从他的名字判断，益西坚赞应该是一名王室僧人，至少在他的晚年；但是 T. 1874 中，他加上了常见的称呼“阿达”以及更高级别的“拉赞普”。他的大概年代可以从他的印度合作者莲花密或莲花护 (*Kamalaguhya* 或 *Kamalagupta*) 推断出来，他也与仁钦桑布合作过。

⑥ BA, 205.

徒们)进行了许多错误的修行以获得解脱、修习瑜伽”^①。因此国王们采取步骤反对密教以更令人反感的方式修行,在一个未知的年代由益西沃签署的呼吁书中,他反对这种令人讨厌的潮流,强烈地提出需要遵循印度文献,因为那些才是正统做法的主要标志^②。阿底峡本人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从这一政策及其施主的意愿。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在托林寺建立了一个密续院(Rgyud bzhi sde),并且住在那里^③。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建立的噶当派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古格诸王也接受并遵循之。

几年后,一个有意思的文献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古格诸王与噶当派有合作。在水猴年,颇章·喜瓦沃在布让王宫向俗众和宗教信仰徒签署了一个文告之类的东西,强调需要严格遵循寺院戒律,谴责那些被异教徒(Shaiva yogins?)影响的圆满(Rdzogs chen)教法^④。

属于同时期的一条有年代的信息:“阿达·沃德赞恭敬地邀请赞普赤·扎西德赞(btsad po Khri Bkra shis lde btsan)至堆(Stod)。他们在堆的宗教研究处碰面。计算(这件事的)年代(是)公元1057年^⑤。”

客人的名字里有一个古老的称号——赞普(btsad po),由于德赞(lde btsan)之前缺乏决定性的要素,因此难以判定。这是我们拥有的关于那一时期藏族统治者之间外交关系的唯一证据碎片。

那些年是王国的巅峰时期,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它是西藏最辉煌的宗教、文献和艺术活动的中心,政治中心仍是布让。阿底峡受邀至布让,古格在他的传记中明显缺失,即使象雄这个名字也只作为仁钦桑布的诞生地而出现。另一方面,甘珠尔和丹珠尔中为数不多的跋记中提到的统治者的名字和翻译地点表明,托林寺几乎总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整个发展的高峰是1076年,由沃德的儿子、继承者孜德(Rtse lde,约1060—1080年)与他的叔叔喜瓦沃一起召集的宗教法会(chos 'khor)。西藏的精英学者都参加了,历史文献没有给出集会地点的线索,但是《量评释庄严》(Pramāṇavārttikālamkāra)译本(T.5719)的第二个跋记提到,一场伟大的印度和藏族学者的集会发生在托林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场集会如同预期的那样,发生在王国的主要宗教中心。

孜德继续王室赞助,他邀请了几名学者。其中之一为克什米尔的班智达智圣(Jñānaśrī),他在塔波寺停留了三年多^⑥。1075年,国王资助了俄译师·洛丹歇饶(Rngog Lotsawa Blo ldan shes rab, 1059—1109年)的印度之行。

① NGCB, f. 126b.

② 由噶尔美出版, Karmay (噶尔美) 1980a。参见 Snellgrove (斯奈尔格鲁夫) 1987: 186—188 和 474。一个相当模糊的暗示可以在 NEL, 153 中察觉出。

③ VS, f. 219a.

④ 由噶尔美出版, Karmay 1980b。噶尔美提出水猴年相当于 1092 年, 有点令人怀疑, 但仍可考虑。1092 年似乎对于约 1040 年已经组织了邀请阿底峡的队伍的王子来说太晚了。由于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出自一部约 1600 年的著作, 我们怀疑只有生肖纪年的部分是原始的, 因为这几乎是当时的一个规则。SNTM, f. 315a 巧妙地谈到, 在他的时代 (1167 年), 十二纪年法是最常用的; 的确有些人也用六十纪年法, “但不能说那是常见的一种用法” (de thung mong la grags pa ma yin no)。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目前的情况是晚期的重构, 猴年应为 1058 年。

⑤ De nas Stod du mnga' bdag 'Od lde btsan gyis / btsad po Khri Bkra shis lde btsan (省略了) phyag nas spyang drang pa'i tshé / Stod kyi chos nyom (nyam) pa'i ra sa (pa'i sar) 'dzims ('dzom dus) su brtsis pa la 3190 (SNTM, f. 317a; SKP, f. 298a)。

⑥ 有一份长长的孜德邀请的印度学者名单, 发现于 DEU/2, 148 和 GBYT, I, f. 155a—b。

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一件事，它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布让—古格地区的政治平衡，但是还不能最后确定。根据《拉达克史》(*Chronicle of Ladakh*)，一个有着纯粹印度名字的国王乌他帕拉(Utpala)入侵了库鲁(Kulu)，使之成为了一个附属地。“然后他征服了从洛波(Blo bo)和布让到南面的哲桑(Bre srang)地区以及曲拉买巴(Chu la me 'bar)”^①，西面和北面的其他地方除外。所有当地头领都要上贡和到他的王廷去^②。洛波(Blo bo)或罗波(Glo bo)是尼泊尔的穆斯塘。哲桑不能断定，曲拉买巴是穆斯塘南部的穆提那塔(Muktinath)神庙。

图齐提出乌他帕拉可能属于渗入西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说雅利安语的族群^③。即使只是猜测乌他帕拉的征服年代也是无望的。在拉达克的王室名单中，他是继贝考赞(905—923?)之后的第七任统治者。他还是从俄珠衮(Dngos grub mgon, 1213年在位)起倒数的第七任统治者。经粗略估算，乌他帕拉可能介于那两个年代之间，即大约1060年。不过，拉达克的早期王系极不可靠，并且乌他帕拉的军事运动在所有的其他文献中都未见记载，悬而未决。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持久的影响。

几乎所有文献都只知道孜德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旺德(Dbang lde)、巴德('Bar lde)、巴勒(Bha le)。从两部《德乌史》(*Lde'u Chronicles*)中，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曙光，但是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孜德的继任者名单两次被其他的事情打断，在第一部史书中出现的名字在第二部史书中缺失，反之亦然。撇开细节不谈，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孜德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旺德(约1080—1100年)，在文献中被提及时附有诸多赞誉之词，但在《量评释庄严》跋记的结尾处则只有简单的称呼“人主”(mi'i dbang po)，他继续支持俄译师的印度研究^④。他的弟弟是沃巴德('Od 'bar lde)，巴德是其名字的缩写形式，巴勒是其名字的错误拼写。他在托林寺建立了札林坚郭巴寺('Dzam gling rgyan bkod pa gtsug lag khang)。孜德的另一个儿子，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是恰钦('phyar chen)，他成为了一名僧人，是定日(Ding ri)附近有名的帕当巴(Pha dam pa)朗郭(Glang skor)殿的共建者^⑤。

沃巴德(DEU/1)或旺德(DEU/2)的儿子是索南德(Bsod nams lde)，后者有三个儿子。长子扎西孜(Bkra shis rtsegs)被噶逻人杀害；二子(未给出名字)充任摄政，但也被杀害了；三弟沃巴德呆在噶逻人的领地，可能是作为俘虏^⑥。两部《德乌史》均以这条完全孤立的信息结束了对布让诸王的叙述。他们指出这是长系(gcen rgyud)，可追溯至神话中的恰赤王(Bya khri)，别名补德贡杰(Spu de gung rgyal)，并就此结束了故事的叙述。两部文献显然都没有意识到，或许是选择忽视噶逻人入侵后的发展情况，此次入侵大约发生

① LDGR, 35. 225—8。

② Tucci (图齐) 1956: 109。

③ 关于旺德的宗教活动，也可参见 NYANG, f. 511b 和 KPGT, II, 337。在 BA, 325 中他以旺秋德(Dbang phyug lde)的名字出现；但是在同一页的下一行，他被称为旺德。旺秋德还出现在 *Bka'gdams gsar rnying gyi rnam par thar pa*, f. 112b 中。BTCB, 216 提到过一个赤·扎西·旺秋南喀赞，是资助俄译师的统治者 (Obermiller 对这段的翻译有误)。他是不同于旺德的另一个人，因为在 YLJB, 127 中同时提到两者都是俄译师 1092 年返回阿里后赞助人。这也证明旺德当时仍然在位。

④ BA, 913。

⑤ 相关的段落是：DEU/1, 383, 1.2; id., 383, II. 11 和 12; id., 384, 1.1; DEU/2, 1.2 和 1.10。关于噶逻的一些讨论，参见附录 A。

于12世纪中叶。

四、亚泽王国的兴起

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德乌史》中提供的孤立信息，事实是，在那些年里，西喜马拉雅地区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它暗示了与过去的割裂，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的。导致和形成这种转变的事件很难澄清，因为史料中的大部分内容互相抵牾。我们发现，一方面，坚实的障碍来自于西藏的史学家，他们的西藏西部诸王名单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一则梵文题记，尼泊尔西部都鲁（Dullu）的克提斯坦巴（*kīrtistambha*）（或帕夏斯蒂 *praśāsti*），断为1357年^①，它大部分与西藏传统中诸王的名字一致，但明显不同的是关于新王国的第一个朝代和第二个朝代的来源。我认为，到了该矫正天平的时候了，迄今，天平过于偏向于西藏的传统，现在需要给予帕夏斯蒂更多的关注。接下来的段落将尽最大可能，尝试建立起那个让人困扰的时期的一个能令人接受的重构^②。

如前所述，西藏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对噶逻之祸一无所知，但是仍然提供了一些暗示，指出在王国发展史上有一个中断。布顿和《俄尔史》关于诸王的名单都结束于旺德。其他的大多数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老生常谈，用“继他之后，×”代替“他的儿子是×”，给出了名字但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这似乎表明，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系谱，而只是一个互相有联系或没联系的名录。

根据所有的晚期文献，旺德或巴德的下一任国王是扎西德（*Bkra shis lde*），或许与被噶逻人杀害的扎西孜是同一人。下一任统治者的名字有多种不同的拼写：巴德（*Bha lde*）、巴热（*Bha re*）、巴勒（*Bha le*）；看起来像是笨拙地试图在外来名字上加一件西藏的外衣。下一任王有个纯粹的梵文名字：那伽德瓦（*Nāgadeva*），有时候藏化为那伽德（*Nāga lde*）。

大部分史书暗示出，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序列出现了断层：“一般一致认为古格、布让和芒域（这里=玛域）的赞普传承至这位国王（即那伽德瓦）^③。”或者是由于类似战争的事件造成的震动的后果，或者是由于其他尚不为人知的原因，以“赞普”为首的西藏西部联邦不复存在了，它的每一分部都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这里出现了都鲁题记，它涉及了两个不同的系谱。碑正面提到的家族是14世纪的，补充了已经消亡的主要王朝的继承者，这名继承者是国王帕提威玛拉（*Pṛthivīmalla*，1349—1358年在位）的父亲，他让人雕造了帕夏斯蒂。另一个谱系从正面的最后几行突然开始并且占据了整个背面。它从那嘎惹伽开始，在西藏史书中他几乎等同于那伽德瓦，没有给出那嘎惹伽的父亲和先辈们的名字。他最初的名字叫卡日（*Khāri*），我认为可以确认为[甲地]

① 这则最有意思的题记由图齐公布，Tucci 1956: 46—49；（瑜伽士）那热哈日那它在图齐之外又进行了编辑，见Naraharinath 1955: 58—64（重印：Himavat Samskr̥ti, I/1，尼泊尔历2016年，第40—41页；Sandhipatrasaṅgraha，加德满都，尼泊尔历2022年，第767—768页）。该瑜伽士能够识读该碑正面的第16—25行，至于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

② 接下来的段落并不是打算给出一个亚泽王国的历史，只是旨在纠正和补充我1998年论文（Petech 1988b）的一些特别论点，我的那篇论文，反过来，又补充了图齐1956年的论述。

③ HD, 43. Cf. GR1, 461, KPGT, Ja, f. 142a。这里没有使用“阿达”，而是不恰当地使用了古老的君主的称呼“赞普”。

[Rgyal di]卡 (mkhar), 布让的首府^①。他的统治延伸到了 Jāveśvara [-pradeśa], 尼泊尔久姆拉地区 (Jumla) 一个普通的名字, 并且建立了一个名叫森伽 (Señjā) 的城市, 图齐认为是久姆拉西北的现代的斯伽 (Sija) 或拉玛塔达 (Lamathada)^②。那嘎惹伽之后, 森伽成为了王国的首府, 当地题记中的命名补充了这个名字。

一个世纪以后,《尼泊尔史》(*Nepalese Chronicle*) 和文献记载称呼那嘎惹伽及其继承者的王国为卡斯亚 (Khasiyā), 在菩提伽耶的一位国王于 1278 年竖立了一通碑, 题记中提到过萨帕达拉夏山 (Sapādalakṣa) 的卡萨 (Khāśa) 王国。卡萨显然是个一个雅利安部落, 从噶瓦 (Garhwal) 和/或卡玛昂 (Kamaon) 进入尼泊尔西部, 一些早期的国王曾在这两个地区施加过政治和军事行动^③。图齐认为这是由从山上下来的家族到来之后造成的不安的一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乌他帕拉。至于那嘎惹伽是否真的是卡萨的领袖, 还不能确定。

西藏传统几乎一致认为, 那嘎德瓦的继承者赞秋德 (Btsan phyug lde) “去了亚泽 (Yatshe)” 或 “是亚泽之主” 或 “去了亚泽并统治那里”。亚泽是森伽 (Señjā) 的藏文名字, 自此以后, 那嘎德瓦的继任者们作为亚泽王定期出现在藏文文献中^④。藏族人继续将他们看作是阿里的最高君主, 作为古代君主的继任者 (或者其后裔)。这种虚构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下半叶。

赞秋德或许可以确认为那嘎惹伽的儿子卡帕 (Cāpa) 或孙子卡皮拉 (Cāpilla), 因为都鲁题记记载的比藏文文献中多了一代。赞秋德或卡皮拉之后, 史书和帕夏斯蒂中的王室名单就一致了, 藏文结尾的 *-lde* 对应于梵文 *-calla*^⑤。两则菩提伽耶题记应归于阿索噶卡拉/阿索噶德 (Aśokacalla/Aśog-lde) (1255—1278 年在位) 时期, 之后, 名字的模式就变成了纯粹的梵文结尾 *-malla*, 被藏族人转写为 *rmal* 或 *smal*。这种变化似乎暗示着王朝中印度影响的增长, 不过, 在他们与卫藏地区的联系中仍继续使用老的称呼 “阿达”^⑥。

五、布让, 古格和亚泽, 约 1200—1400 年

那嘎惹伽之后, 森伽/亚泽的国王们显然维持了对古格和布让某种程度上的宗主权, 但是, 由于首府距离遥远, 交通不便, 他们对西部西藏的控制很快就变得流于形式, 而非实质上的控制, 这就产生了一个政治真空, 被实际拥有权力的地方集团所填充, 这也是一种规律。这些新的集团很快 (不清楚有多快) 就独立于亚泽。不清楚古格和布让新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吉德尼玛衮的传承下来的古老家族有关系。无论如何, 在 14 世纪, 布

① 卡日 (*Khāri*) 的名字识读是由那热哈日那它 (Naraharinath) 提出的。图齐存疑地读作 *khyāti*。那热哈日那它将 *Khāri* 辨认为尼泊尔西部久姆拉地区卡冉 (*Khrān*) 的一个村子的名字。但是, 这又使我们陷入一下藏文文献中无法克服的矛盾。YLJB, 72 引用一个色托巴·仁钦多吉 (Gser thog pa Rin chen rdo rje) 的话, 声称亚泽王朝来自噶尔·东赞 (Mgar Stong btsan), 有名的松赞干布的大相, 但这条孤立的信息与坚实的西藏传统相抵牾, 很难让人接受。

② Tucci (图齐) 1956: 112—114。

③ 关于尼泊尔历史上的卡斯亚, 参见伯戴克论文, Petech 1984, 索引。Adhikary 1988 年的论文只是收集了卡萨的题记, 使用方便。作者没有利用最近的文献, 更未接触藏文资料。

④ 最早提到亚泽王的是 GPGT, f. 199b。

⑤ 关于都鲁题记和西藏史书中记载的卡萨王的名单的比较, 参见图齐和伯戴克论文, Tucci 1956: 66; Petech 1988b: 382。

⑥ KPGT, Ja, f. 149a。

顿将象雄王认定为天喇嘛益西沃的后裔。

13 世纪上半叶, 从《科迦寺导读》^①和《凯拉斯圣地导读》^②中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在其帮助下, 我们得以追溯在古格和布让进行统治的一组国王。

这些统治者中的第一位是达察·赤巴 (Stag tsha Khri 'bar)。1213 年, 伟大的克什米尔学者释迦师利跋陀罗 (Śākyaśrībhadrā), 通常以喀且班钦 (Ka che Pan chen) 而闻名, 在他回家的旅途中, 在布让停留了一段时间, 并任却吉杰布·达察 (*chos kyi rgyal po Stag tsha*, “却”意为法, “吉”意为“的”, “杰布”意为王, “却吉杰布”意为“法之王”——译注) 的老师^③。两年后 (1215 年), 古雅冈巴 (Ghu ya sgang pa) 被任命为神山圣湖地区止贡派 ('Bri gung pa) 隐居地的第一任主事 (rector, *rdor 'dzin*), 并受到三位统治者的保护和支 持。第一位是芒域的拉钦·俄珠衮 (*Lha chen Dngos grub mgon*), 在这里芒域指的是拉达克^④。第二位是古格却杰·赤扎西德赞 (*Guge Chos rgyal Khri bkra shis lde btsan*), 关于他我们知道, 几年后他去了科迦, 保护寺庙免受河水威胁^⑤。第三名统治者是杰布拉钦·达察·赤巴 (*rgyal po bla [lha?] chen Stag tsha Khri 'bar*) 及其子南衮德 (*Gnam mgon lde*)^⑥。

《科迦寺导读》也知道达察·赤巴和他的儿子们, 赤·扎西·俄珠衮 (*Khri Bkra shis Dngos grub mgon*) 和南衮德。之后不久, 我们发现一名布让杰布·觉沃·阿底 (曼) [*Purang rgyal po Jo bo A tig (-sman)*] 将科迦寺和其他寺庙捐给止贡派^⑦, 这可能发生在 1219 年, 当止贡派堪布本·歇饶迥乃 (*Dbon Shes rab 'byung gnas*, 1187—1241 年) 在去神山朝圣的路上时, 为阿达·阿底 (*mnga'bdag A dig*) 进行了灌顶, 还有亚泽王^⑧。阿底是达察·赤巴的儿子, 几年之后, 他们两个被一起提到^⑨。非藏族的名字阿底 (A tig/A dig) 似乎属于象雄语^⑩; 或许它是著名的统治者南衮德的方言名字。

约 1240—1250 年, 我们发现一名古格杰布·赤扎西旺秋 (*Guge rgyal po Khri bkra shis dbang phyug*) 及其子贝衮德 (*Dpal mgon lde*) 捐献了一座布让噶尔冬附近的石窟给第二任主事尼玛贡巴 (*Ni ma gung pa*)。大约 1260 年 (?), 古格杰布·赤扎巴德 (*Guge rgyal po Khri Grags pa lde*) 和他的王妃森珠杰姆 (*lha lcam Bsam grub rgyal mo*) 邀请主事至布让, 将上部和下部唐琼 (*Thang chung*) 的土地赐予止贡派¹¹。这些捐献表明当时古格王放弃了布让的权力。

这对王室兄妹在布让接待止贡派主事的地点叫做杰底卡 (*Rgyal di mkhar*)。这座城堡

① 《科迦寺导读》(*Lhar bcas 'gro ba'i mchod sdong Jo bo dngul sku mched gsum sngon byung gig tam dang brjod pa'i rin chen vaidūrya sngon pa'i wang*), 写于 1880 年, 1988 年在达兰萨拉印刷。

② Ti-se; 写于 1896 年。

③ YLJB 179。

④ LDGR, 36.9—12; Petech (伯戴克) 1977: 19。

⑤ 《科迦寺导读》: 47—49。洪水期时, 科迦寺总是处于被孔雀河冲没的危险, Tucci (图齐) 1937: 35。

⑥ Ti-se, 34, f. 28a。

⑦ Ti-se, 36, f. 29a。后缀 *sman* 在这里显得不合适, 它是用来表示神祇和精怪中任何阶层的女性, 也用于女性的尊称, Tucci (图齐) 1949: 720。

⑧ BA 605。或许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恰噶 (*Bya dkar*) 被给予了止贡派, 在格鲁派 (*Dge lugs pa*) 之前一直属于止贡派, VS, f. 220b。

⑨ Ti-se, 37, f. 31a。

⑩ 比较松赞干布的妃子之一象雄妃李提曼 (*Li thig sman*) 的名字, DEU/1, 276, 379; KPGT, Ja, f. 44b。

11 Ti-se, 38, 58, ff. 31b, 54b。

是 13 世纪至 15 世纪布让的政治中心，其位置不是很清楚^①。

13 世纪的第二个 25 年，芒域贡塘的统治者们、扎西孜巴贝的长子拉德的后裔登上了舞台。他们成为亚泽争夺古格和布让最高权力的重要对手。在大约 1235 年爆发的战争中，国王衮布德（Mgon po lde）被亚泽的一名将军打败，逃往吉隆（Skyid grong）并在那里被杀。结果是，亚泽在一些年里保持了在布让的最高权力。然后，芒域通过与萨迦（Sa skya）统治者家族昆氏（'Khon）的联姻加强了实力，恢复了力量。在萨迦武装的支持下，尊巴德王（king Btsun pa lde）彻底打败了亚泽军队（约 1252 年）^②。

当时，一种外来的势力出现在喜马拉雅地区。1268—1368 年期间，卫藏地区，包括下部阿里由中国元朝（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联合萨迦派流治。两名军事指挥官（汉名：都元帅）驻扎在阿里三围。1268 年元朝的人口普查没有涵盖古格和布让，但是在 1287 年的复查时被包括了进去。我们知道阿里几千名霍朵（hor dud，作为统计和税收单位的交税家户）中有 767 名“是源自古老藏王的阿达的子民”^③。这位阿达显然是芒域贡塘的统治者。布德衮王（'Bum lde mgon，生于 1253 年，卒于 1280 年）与萨迦派的紧密联系也使他得到了蒙古人的认可和支持。他成为古格和普兰的最高领主，在那里建立了噶杜·南吉琼宗（Dkar dum Snam gyi khyung rdzong）城堡^④。高效的帝国驿站系统也部分地覆盖了他的领地，玛旁（Ma pang）即玛旁雍措（Manasarowar）地区的“小站”（lesser postal relay, 'jam chung）由古格北部和南部的人充任^⑤。布德衮的继任者赤德布（Khri lde 'bum）还去了元朝首都，并且在那里于 1307 年获得官方承认，获授封号“都元帅”和阿里 13 个区（tsho）的领主。对他的任命使他成为中央政府在当地的代理人^⑥。

蒙元的影响可有与蔡巴派（'Tshal pa sect）在布让处于支配地位有关。这一教派及其在拉萨地区的万户（khri skor）早在 1251 年就被置于忽必烈的保护之下（实际上是作为他的封地）。他继承帝位后，他和他的继任者总是将蔡巴派安置得很好^⑦。《红史》（*Hu lan Deb ther*）中记载的该教派的历史告诉我们，茹托巴·桑结沃（Ru thog pa Sangs rgyas 'od）生活于 13 世纪早期，居住在米拉日巴（Mi la ras pa）的六宗（Rdzong drug）和凯拉斯（Kailāsa，即神山）附近^⑧。他的弟子多丹·达玛索南（Rtogs ldan Dar ma bsod nams）肯定将驻地和活动转移到了门香（Men zhang）^⑨、布让、多波（Dol po）和洛波（Glo bo）。当多丹·永萨巴（Rtogs ldan G · yung sa ba）被任命为布让王的轨范师（bla mchod）并居住在王宫时，蔡巴的影响臻至巅峰。他的尊贵地位被喇嘛楚达巴（Tshul dar ba）继承，接下来是喇嘛歇饶

① 或许应该去孔雀河外面寻找杰底。

② KT 1748, 94; Jackson (杰克逊) 1976/1977: 41。关于贡塘从 13 世纪中叶至 14 世纪中叶的最高统治，也参见 Jackson (杰克逊) 1978: 214。

③ Petech (伯戴克) 1990: 53。

④ KT 1748, 108。

⑤ Petech (伯戴克) 1990: 65。

⑥ KT 1748, 113; Jackson (杰克逊) 1976/1977: 45。

⑦ Petech (伯戴克) 1990: 11, 87, 95。

⑧ MLRP 第 156—157 页中列出了“六宗”。

⑨ 门香是一个游牧部族，11 世纪晚期从古格迁徙到羌，即扎杜孜（Pra dum rtse, Tradum）地区。他们的一部分转回了卓雪（Gro shod）。直到 15 世纪早期，门香一直在芒域贡塘发挥着政治作用。据维大利先生（Mr. R. Vitali）于 1995 年 6 月在奥地利色高城堡（Schloß Seggau）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培 (Shes rab 'phel), 后者被布让王赐予“仁钦桑布建立的色康殿”(可能是托林寺)^①。另一处捐赠是喜德祖拉康 (Bzhi sde gtsug lag khang), 可能是王室驻地杰底卡的主殿。他的继任者桑结沃 (Sangs rgyas 'od) 也是布让王的一名轨范师, 他还访问了古格, 并在那里充任了一段时间国王的老师, 然后他回到了布让, 在那里还有门香, 他进行了大量的宗教活动^②。至于我们的这部分故事, 没有年代, 甚至没有一个可资比较的年表。不过, 既然桑结沃活跃于《红史》的编著时期 (1346 年), 我们或许可以将布让蔡巴轨范师们的系列放在 13 世纪晚期和 14 世纪早期。如果色康殿真的是托林寺, 这可能暗示着当时布让王对古格的统治。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位统治者赞助了蔡巴派, 但我们可以冒险猜测一下。《科迦寺导读》中包含有显然是统治布让的国王的年谱残片。它从我们知道的达察·赤巴 (Stag tsha Khri 'bar) 开始, 接着是他的两个儿子赤·扎西·俄珠衮 (Khri Bkra shis Dngos grub mgon) 和南衮德 (Gnam mgon lde)。后者的儿子是赤·扎西·杰波德 (Khri Bkra shis Rgyal po lde), 然后继位的是赤·扎西·朵丹德 (Khri Bkra shis Stobs ldan lde), 王室喇嘛 (lha btsun, 拉尊) 多吉森格 (Rdo rje seng ge) 和赤·扎西·索南德 (Khri Bkra shis Bsod nams lde)^③。这些名字的模式与 11 世纪王的名字一样, 也大体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使我们得以推断这些模糊的统治者曾是蔡巴派祖师们的赞助人。

最后一位王的名字将我们引回到了亚泽。14 世纪 30 年代晚期, 源自那嘎惹伽的亚泽/森伽王朝已经消亡, 一名新的统治者被选出来即位。根据西藏的史书, 他的名字是索南德 (Bsod nams lde), 布让王^④, 显然与《科迦寺导读》中提到的统治者一致。他一登上森伽王位, 就将他的名字翻译为彭雅玛拉 (Punyamalla, bsod nams = punya), 都鲁题记和《尼泊尔史》中, 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而闻名。这里出现了一个谱系上的严重问题, 我们在其他地方将会谈到 (附录 B)。

西藏的历史得到了一条独立证据的支持。伟大的学者布顿·仁钦珠 (Bu ston Rin chen grub) 发出了一封信, 日期为 1339 年 7 月 3 日, 给“伟大的护法王, 伟大的神圣统治者”索南德, 他被选为西藏西部的王^⑤, 没有提到居住地的名字, 显然, 他迁居到了亚泽, 但仍然保持对他家乡的统治。

随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布让作为一个独立的邦国最终走到了尽头。后来的文献中再没有出现布让的王, 只有头领或地方首领 (sde pa)。直到 14 世纪末期之前, 这一王国一直保持与亚泽的联合。

至于古格, 除了蔡巴·桑结沃的到访, 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只能补充布顿 1339 年 9 月 18 日的一封信, 是写给一位不知道名字的象雄古格王, 乞求他遵循天喇嘛益西沃和仁钦

① “色康殿”作为托林寺的一个名字在由颇章·喜瓦沃翻译的《迦罗波小注中弟子利益》(Kalāpalaghuvrttiśiṣyahita) 的跋尾中已经出现 (T.4284)。也可参见 VS, f. 219a。

② HD, 147-148; 参见 Yamaguchi (山口瑞风) 1992: 61-62。

③ 《导读》: 47, 55。这些名字中没有一个出现在 Ti-se。

④ 他至少从 1323 年开始统治布让, 因为在那一年, 布顿给这位却杰·索南德送了一封信, 见 BTNT, 121。

⑤ *Dpal chos skyong ba'i rgyal po chen po lha mnga' bdag chen po...mNga'ris stod du rgyal por bskos pa bzhin* (《布顿全集》, La, ff. 90b, 96a)。一段时间之后 (?), 彭雅玛拉派出了一个表达敬意的使团, 带着礼物, 见 BTNT, 122。

桑布建立的榜样保护宗教^①，这个日期只比给索南德的贺信晚了几个月。除此以外，一般来讲，14世纪下半叶的古格历史是一片空白。

当时的一个主要事件是蒙古—萨迦势力的衰亡。早在1324年，由于将家族和财产分成了四支（*pho brang*，颇章），萨迦派的实力被严重削弱。并且，随着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领袖绛曲坚赞（*Byang chub rgyal mtshan*）实力的逐步上升，萨迦的势力进一步削弱，当时中国的元王朝也走到了尽头。蔡巴在拉萨地区的政治实力被绛曲坚赞于1350年夺去^②，这可能导致了蔡巴在布让影响的完全消亡。

在一些年里，亚泽似乎是喜马拉雅地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彭雅玛拉的儿子帕提威玛拉（*Prthivīmalla*）——都鲁帕夏斯蒂（*Praśāsti*）题记中赞颂的统治者，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尤其是萨迦派的慷慨赞助者。1350年，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萨迦和拉萨，带着奢华的物资重新装修大昭寺。他甚至试图调停正在卫藏地区进行的自相残杀的斗争^③。他是西藏史书列举的王系名单中的最后一位亚泽王。

他的继任者苏雅玛拉（*Sūryamalla*，1367年在位）和阿巴雅玛拉（*Abhayamalla*，1376—1391年在位），只能从他们的题记中知道一些，主要是以当地的语言写的，只有介绍部分是以华丽的梵文表达^④。阿巴雅玛拉时期，王国崩溃，其后的残余部分处于印度头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使用一种不同的名字模式，首府也从森伽转移到了久姆拉（*Jumla*）。其中的第一位是比里惹伽（*Bilirāja*，1398-1406年在位）。根据晚期的资料，他是当地（门，*Mon*）出身的一名大相，篡夺了王位^⑤。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一名佛教徒。此后，亚泽，现在叫做久姆拉，永远地从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中消失了。邦国一直持续到1788年被尼泊尔的郭尔卡（*Gorkha*）王国吸收。

喜马拉雅历史中森伽/亚泽的卡萨王国所起的作用值得评述。即使我们不接受古老的布让王国被噶逻所推翻的故事，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亚泽代表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新的政治实体。就我们所能看到的，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主要是趋向尼泊尔，这与同芒域贡塘的冲突、偶尔对拉萨和萨迦（还有菩提伽耶 [*Bodhgayā*]）神殿的赞助、藏族人认为亚泽王朝是老政体的继承者的虚构并不矛盾。这个王朝的碑铭是印度的，题记的时代是印度的，其上升和繁荣的环境主要是印度的。它的历史属于各个混杂的邦国，但主要是印度文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扩散。国王赠送艺术家（*lha bzo pa*）的作品有塑像和绘画，装饰拉萨的大昭寺，或许还有一些萨迦的建筑，从中可以看出西藏艺术中尼泊尔影响的增强，当然亚泽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古格王国（约1400—1630年）

1400年左右，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政治场景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首先，芒域贡塘

① 《布顿全集》，La, f. 96a—b。

② 关于蔡巴的衰亡，参见 Petech (伯戴克) 1990: 109。

③ 参见伯戴克的引文，Petech 1988b: 381，注释 91。具体的时间发现于 *Rlangs kyi po ti bse ru rgyas pa*，恰白·次旦平措（*Chab spel Tshe brtan phun tshogs*）编，拉萨，1986年，第202页。

④ 关于森伽/亚泽的晚期国王的题记，参见 Adhikary 1988，附录 33—37，39。

⑤ KT 1745，75。

的势力在索南德王(生于1372年,卒于1404年)统治期间有了暂时的复兴。他收复了布让,显然是从亚泽的统治下夺取来的,可能当时后者由于比里惹伽篡夺王位,造成了国家的震荡,给其以可乘之机,从中获益。

但是同样的命运,政治解体,立刻就降临到了征服者的头上。这主要是由索南德自己造成的,他将洛波(Glo bo)即今天的穆斯塘还有布让作为封地赐给却迺布(Chos skyong 'bum),一名门香的将军的弟弟,他曾征服了布让^①。在却迺布的儿子阿麦边(A me dpal)时,新的邦国获得独立,他保持了对布让的控制,并且通过随意任命和撤掉噶尔冬城堡的指挥官们来加强其权力。噶尔冬城堡成为当时和随后一个时期那个地区的战略要地^②。

贡塘无法做出反抗。索南德1404年逝世之后,王位被他的遗孀,古格公主却杰姆(Chos rgyal mo)篡夺,她作为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着王国(mnga'bdag chen mo),直至1419年,终于由正当的继承者、她的继子赤·拉旺坚赞(Khri Lha dbang rgyal mtshan)得以继承王位^③。这种困境阻止了任何想重建对洛波宗主权的尝试;芒域贡塘完全地从古格的政治地平线中消失了。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宗教事件是由宗喀巴创建的新的格鲁派的渗透。改革是由却杰·阿旺扎巴(Chos rje Ngag dbang grags pa)引入古格的,他是阿里本土人,宗喀巴的弟子,从卫藏回来后首先在老(sa rnying)东嘎(Dung dkar)定居了下来^④。他的宗教活动受到古格王室三兄弟的关注,扎西德(Bkra shis lde)、赤·南杰沃(Khri Rnam rgyal 'od)和释迦沃(Śākya 'od)。最后一位肯定是(或成为)一名僧人,因为他作为芒囊寺的堪布而出现。这三兄弟雇用阿旺扎巴来驱除萨迦派人或止贡派人都没能降伏的女精扎巴·本姆(Bkra pa Dpon mo),然后国王(或他的继承者;没有给出名字)接受了新教派并且允许它的传播。因为当时没有一名萨迦派学者或化身(dge bshes sprul sku)呆在古格王廷,因此没有人反对,这也促使了变革的发生。阿旺扎巴的成功快速而彻底,王朝成为格鲁派的忠实支持者。阿旺扎巴被任命为托林寺堪布,随后又接替释迦沃成为芒囊寺的堪布^⑤。他创建了“新托林寺”^⑥,或许意味着寺院建筑群的大规模重建。

从赤·南喀旺波(Khri Nam mkha' dbang po)(或旺秋 dbang phyug)·彭措德贝桑布(Phun tshogs lde dpal bzang po)可以看出,国王决定推动新流派在古格的传播。这一冗繁的名字在文献中有各种缩写。与他的前辈相比,他的形象稍显清晰。我们知道他与卫藏地区宗喀巴的弟子们和精神传人们之间保持有密切的联系。他请嘉察·达玛仁钦(Rgyal tshab Dar ma rin chen, 1364—1432)为Rājaparikhā-ratnamālā作注疏^⑦。他向克珠杰(Mkhas grub

① KT 1748, 119。

② Jackson (杰克逊) 1978: 216。

③ KT 1748, 121—122。

④ 阿旺扎巴,古格的传教士,不同于充任芒域贡塘索南德王的老师——译师·阿旺扎巴(KT 1748, 120),他去萨迦请教其工作在阿里失败的人为的和超人的原因解释(SNLG, f. 3b)。译师生活于早一代的时期,是一名萨迦巴而不是格鲁巴。

⑤ VS, ff. 218b—219a. VS的阿里章页,是后面古格王的基础材料,由图齐翻译(Tucci 1971b: 472—488)。关于芒囊寺,参见VS, f. 221a. 图齐注意到了该寺及其重要的壁画,见Tucci(图齐)1937: 57—63。现在已不存了,该寺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毁。

⑥ Bka'gdams gsar rnying gi chos 'byung (《新旧噶当派教法源流》), f. 98a。

⑦ 《达玛仁钦全集》, Ka/8。

rje, 1385—1438)发出邀请,但收到了委婉的拒绝^①。克珠杰回礼,与王后赤姜杰姆(Khri lcam rgyal mo)交换信件,王后从他那里得到了一首简短的上乐(Cakrasamvara)的赞辞。她去了那塘(Snar thang),在那里受到灌顶^②。国王与赤·南杰(Khri Rnam rgyal)(或许等同于前面提到的赤·南杰沃 Khri Rnam rgyal 'od)一起,为阿旺扎巴在东嘎建立了扎西却林寺(Bkra shis chos gling)^③。

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是札不让(Tsaparang)众寺庙的建立。在国王赤·南喀旺秋·彭措德时期,一位当时尚不知名的大师,名叫哈色·帕巴·益西追珠(Ha se 'Phags pa Ye shes brtson 'grus)(显然是一名格鲁巴),在札不让建立了寺庙哲丹(Bre ldan)和洛当(Blo stangs),也被称为扎西达结(Bkra shis dar rgyas)。它们是为了分别用于寺院夏、冬两季的驻地,但被认为是一座单一的建筑^④。可能与此同时,或稍早时期,宏伟的札不让宫殿已经开始建设,并成为(或许不是马上成为)王宫所在地^⑤。

阿旺扎巴同时被任命为洛当的堪布,这样就完成了他和格鲁派对王国主要寺院的控制。同西藏任何地方一样,古格老的噶当派建筑没有任何反对就接受了改革。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不能特别精确、肯定,但可能发生在15世纪20年代。不晚于国王同达玛仁钦的接触,后者逝世于1432年。

布让的宗教转变遵循了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1436年,贡嘎桑布(Kun dga' bzang po, 1382—1456年),俄尔寺(Ngor)和萨迦派俄尔支派的创建者,第二次访问洛波,受到了极大的礼遇。当时,南(喀)孜(摩)(Nam [mkha'] rtse [mo]),负责喜德(Bzhi sde)的官员(drung),同古格王赤·南喀旺波商议之后,派古格堪钦·却吉森格(Gege Mkhan chen Chos kyi seng ge)去邀请俄尔大师到布让(不是古格)。他接受了邀请,在一百名陪同的伴随下,去了杰德乌(Rgyal de'u)(即杰底卡),并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他向科迦寺有名的大佛像敬献了大量的供养,并在杰德乌、聂孜日(Nya rtse rig)和喜德的寺院讲课和给予灌顶^⑥。除了对古格的国王和僧侣表现得彬彬有礼之外,古格显然被排除在外了。

俄尔派活动的政治背景很清楚。布让是洛波的依靠,官员南喀孜摩对洛波统治者而言,显然是当地的代表或首领。阿麦边(A me dpal)的儿子和继任者阿麦桑布(A me bzang po)对布让的控制如此彻底,以至于除了在科迦寺进行修复活动外,他还能够将神殿从止贡派手中拿走,赏赐给俄尔派,现仍属于后者^⑦。我们或许可以增加一点信息,1449年,贡嘎

① 《克珠杰全集》, Ta, ff. 86a—87b。

② 信件:《克珠杰全集》, Ta, ff. 87b—89a。注疏: *Bcom ldan 'das 'Khor lo bde mchog yab yum la mdun par bstod pa'i rab tu byed pa*, 前引著作, ff. 18b—20b。灌顶: KHGJ, f.11a。

③ VS, f. 222b, 这里这位古格王的名字缩写为赤·旺秋德(Khri Dbang phyug lde), 其身份似乎可以肯定。参见 Yamaguchi (山口瑞凤) 1992: 67, 72—73, 注释 7。关于东嘎的寺院和壁画, 参见 Tucci (图齐) 1937: 170—171。

④ VS, f. 219b。哲丹, 即上部札不让的寺庙建筑, 1933年已经完全成为了废墟(Tucci & Ghersi 图齐和杰西 1934: 304—310)。唯一尚存的建筑是小的上乐殿(Bde mchog chapel), 图齐著作中有描述(Tucci 1936: 16—74)。洛当, 在17世纪已被广泛地称为洛塘(Lo thang), 位于城堡下面的平地上, 图齐也提到过, 见 Tucci 1936: 167—169。洛当在札不让有名无实,《黄琉璃》中没有提到哲丹有独立的堪布。

⑤ 关于札不让及其寺庙, 参见山口瑞凤的讨论, Yamaguchi 1992: 67—69。在古格都城转到札不让之前, 没有资料告诉我们古格都城的名字, 可能是托林, 它在益西沃时期肯定起着都城的作用。这两个地方相距仅10公里。

⑥ NGNT, f.38; SNLG, ff. 7b, 10a。

⑦ 《导读》: 49. Ti-se, 39, f. 32b; Pranavananda 1950: 104。根据 DMSM, 170, 洛波首领强制地将各个教派的寺院改宗萨迦派或俄尔派。他对格鲁派表现出特别的敌意。

桑布从阿里收到了 300 盎司黄金的礼物,在他生命的晚期,他又在科迦寺度过了一段岁月^①。

古格向俄尔派贡献了一些学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格班钦·扎巴坚赞 (Grag pa rgyal mtshan),他成为了有名的洛波堪钦·索南伦珠 (Bsod nams lhun grub, 1456—1532) 的老师^②。古格王赤·南喀旺波自己放弃了王位,受戒出家,他“翻修了伟大的寺院”^③。

对和平和福祉的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来自霍尔 (Hor) 的入侵。15 世纪 40 年代,霍尔武装团体再三进入芒域,抢劫官员们在北部叶茹的金田和北部羌地牧场的木人 (*shing po*) (木材运输人?)^④。由于担心他们也渗入卫藏地区,有名的圣人和桥梁建造者唐东杰布 (Thang ston rgyal po, 1385—1464 年) 化解了危险,他修复了莲花生许多世纪之前“在霍—藏边界”建立的萨玛孜 (Sa'i ma rtse) 佛塔。这是他 1448 年在拉堆 (La stod) 北部的昂仁 (Ngam rings) 停留期间所做的事情^⑤。很显然,掠夺者是来自中亚 (Stod Hor, 上部霍尔) 的突厥人。古格和布让也被卷了进来,因为《科迦寺导读》告诉我们霍尔抢劫了神殿^⑥。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来自中亚的劫掠与《克什米尔史》中的一次进入联系起来。它告诉我们,赞乌·阿比底 (Zain ul Abidin, 1420—1470 年) 国王“在 (临时) 占领宝它-布米 (Bhautta-bhūmi) 期间,对郭噶德萨 (Goggadeśa) 的人民给予了武装保护。在萨雅德萨 (Śayādeśa), 国王令人钦佩的指挥官从雅瓦那 (Yavana, 穆斯林) 手中抢救了一尊金佛像”^⑦。90 年前,弗兰克 (A.H.Francke) 辨识出郭噶德萨就是古格。但是在《Rājatarāṅgiṇī 史》中,宝它或蕃它 (Bhoṭa, Bod, 西藏) 是拉达克的常规名字,萨雅 (Śayā) 肯定是列城 (Shel, Sheh), 上部拉达克的古老首府。由于故事的场景限于拉达克地区,我认为可以将郭噶 (Gogga) 比定为日土或其附近的郭 ('Gog) 金田,在《拉达克史》中提到过两次^⑧。事件的顺序或许根据以下的线条得以重建:赞乌·阿比底进入拉达克,征服列城并追击中亚劫掠者,从其手中找回了一尊金佛像。为了保护郭金田免遭霍尔的劫掠,他也进军到了那里。这暗示着喜马拉雅地区为保卫金田、反对来自北方的侵扰而达成了某种团结。

不过有可能是,那一时期见证了洛波对布让控制的终结,后者在 15 世纪后半叶重又进入古格的霸权掌控之下。

关于上部拉达克王——洛卓却丹 (Blo gros mchog ldan, 约 1435—1460 年) 入侵的一个模糊报道中勾勒出了另一次严重的骚乱。他从阿里三围带回了一套珍贵的装束,有铠甲、剑、刀、绿松石、马鞍、马等^⑨。我们还不知道古格是否受到了国王这次抢劫的影响。

1472 年,一次严重的冲突在古格和南部拉堆之间爆发,导致在洛波寺院的教学中止了三年。战争的第二年,一场战斗打响了^⑩,但是关于战争的动因和结果,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① NGNT, f. 40b.

② NGCB, f. 171a; NGNT, ff. 35a, 41b; SNLG, f. 7a.

③ NGNT, f. 39a: chos sde chen po gsar du btsugs.

④ 关于羌,参见本文第 153 页注释⑨。

⑤ THST, ff. 130a—b, 136a—140a.

⑥ Tucci (图齐) 1956: 62—63.

⑦ Bhoṭtabhūmau mahīndreṇa Goggadeśe kadacana/ bāṇagaurakharā-streṇa guṇair-lokās-ca rakṣitāh// samijjite Śayādeśe krūrādeśo mahīpatih/ suvarṇa-Buddhapratimā Yavanebhyo rarakṣa sah// Jonarāja's *Dvīṭya Rājatarāṅgiṇī*, vv. 1106—1107.

⑧ LDGR, 35.15—16.

⑨ LDGR, 37.3—8.

⑩ SNLG, f. 23a—b.

同样不知道的是南喀旺波继任者(们)的名字,在其统治下,发生了上面勾勒出的事件。笼罩在王室系谱和年表上的迷雾只能随着洛桑饶丹(Blo bzang rab brtan)——法王佛之子的出现而消散。这位国王是格鲁派的赞助者、阿旺扎巴传统的坚定追随者,与止贡堪布贡噶仁钦(Kun dga' rin chen, 1475—1527年)、洛波统治者藏巴·扎西衮(Tshangs pa Bkra shis mgon, 卒于1489年)及其弟弟洛波堪钦·索南伦珠(Glo bo Mkhan chen Bsod nams lhun grub, 1456—1532年)是同时代人^①。他可能也是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Dge 'dun rgya mtsho, 1475—1542年)在其第十年的时候(1483/1484年),给其写信的那位不知名的古格王^②。这些信息使得我们将他的统治放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些年里。他的妻子顿珠玛(Don grub ma)在札不让建立了红殿(Mchod khang dmar po)并且进行了奢华的装饰^③。当时,统治者(sde pa)贡[噶]萨[珠](Kun [dga'] bsam [grub])代表古格统治布让^④。

洛桑丹(Blo bzang brtan)的儿子帕巴拉('Phags pa lha)、第二世达赖喇嘛两封信件的收件人^⑤,在“疯圣”藏宁嘿如迦(Gtsang Smyon Heruka, 1452—1507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朝圣凯拉斯(1496年)的时候可能在位。他前往神山之前,在布让的噶尔冬作了短暂的停留。他访问期间,洛波王德勒嘉措(Bde legs rgya mtsho)和布让僧官(dpon btsun)念扎(Snyan grags)之间正打着仗,念扎承认古格的宗主权。由布让武力控制的杰底宗(Rgyal ti rdzong, 同杰底卡一样)经受了长时间的围困,“圣人”试图调停,刚开始没有成功,于是他退回杰底。尽管在一次突发的交战中布让人取得胜利,杀死了许多洛波士兵,但最后他们仍被迫放弃。双方达成了协议,原来上交古格的税收和强制性劳役('u lag)被转给洛波^⑥。据我们所知,这份协议很快就废弃了,布让回归古格。

下一任国王是释迦仁钦(Śākya rin chen)。他的哥哥释迦沃(Śākya 'od)受了戒,领导格鲁派僧侣,被称为“杰尊”(rje btsun),在托林寺的一幅壁画中甚至被给予“遍知”(thams cad mkhyen pa)的称呼。释迦仁钦或许可以判定为与二世达赖喇嘛交换信件的幼主(bdag po sku gzhon pa)^⑦。他可能在西藏西部成为穆斯林指向拉萨的侵犯目标时统治着古格。穆斯林军队的领导者为喀什噶尔王子米热·海达·都拉(Mirza Haidar Dughlāt),曾经入侵并占领拉达克。1533年7月他从列城出发,沿着商贸路线(rta zam)到达玛旁雍措湖,然后向南,于8月22日抵达布让的噶尔冬。当地的城堡抵抗了所有的袭击,可能由尼泊尔国王派遣的一支由3000名步兵组成的营救队伍被艰难地挡了回去,米热·海达的兄弟在战斗中杀死。

征服者离开布让继续向西行进。但是严寒和高海拔摧残了马匹,最终他只剩下了90名有装备的随从。因此在他抵达距卫藏(Dbus Gtsang, 拉萨)只有八天路程的一个地方时不

① Ti-se, 39, f. 33a 中, 扎西衮和索南伦珠被错误地称为古格王子。

② 《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ī, ff. 20b—21a。

③ VS, ff. 219b—220a。她也收到第二世达赖喇嘛的一封信(《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ī, ff. 30b—31a)。

④ Ti-se, 39, f. 33a。

⑤ 《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ī。第一封信是达赖喇嘛10岁时所写,即1483/1484年,写给一名古格王,没有给出他的名字,但可能是帕巴拉(ff. 20b—21a)。第二封信中,国王的名字又没有出现(f. 21b)。第三封信中,帕巴拉的名字终于出现了,但是没有表明是哪一年(ff. 22b—23a)。最后一封信既无名字也无日期(f. 23b)。

⑥ TSSM, ff. 90a—93b。

⑦ 《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ī, ff. 23a—b; 参见 Yamaguchi (山口瑞凤) 1992: 73, 注释 10。

得不回转。10月27日,他与他的大部队会合。12月17日,他回到一个叫作塔姆里克(Tāmlik)的地方,或许是现代噶托(Gartok)地区的某个地方,他将辎重和战利品留在了那里。并且在那里,一名来自古格的使者拜访了他并许诺要进贡。为了商讨细节,他带着少数几名随从去了古格,距离塔姆里克两天的路程,这不可能是札不让,很有可能是古格边境的一个地区,或许是东嘎。他在那里待了三天,安放了贡物(3000 *mitkal* 黄金),然后回到了塔姆里克,发现了他军队的大部分已经分散了。他到达列城的时候只有一小撮的追随者,他在拉达克逗留了两年,最终从克什米尔撤营^①。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许诺的贡物从来没有兑现。

吉丹旺秋('Jig rten dbang phyug), 释迦仁钦的儿子,其形象稍显清晰,可用的信息足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年表。他与他的弟弟们——绛央巴('Jam dbyangs pa)和恰多(Phyag rdor)一起,在札不让建立了白殿和金刚持殿^②。同格鲁派首领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1537年,国王从第二世达赖喇嘛处获得了一部关于 Śūnyatā-saptati 的简短注疏^③。几年以后(1540年),他资助了一项大规模的事业:他同他的大相阿旺南杰(Ngag dbang rnam rgyal)一起,向达赖喇嘛运送了大量的物资材料,请求在卫地翁山谷('On valley)谷口建立一个大的学院,名字也因此叫做阿里扎仓(Mnga'ris grwa tshang),成为格鲁派一个兴盛的学习中心,延续至今^④。在那些年里,一位杰出的宗教人物开始了他在古格的事业。这就是香底巴·洛卓坚赞(Sānti-pa Blo gros rgyal mtshan),出生于东嘎,王子迈催巴(Maitri pa)的侄子,建立了香孜寺(Shangs rtse monastery)。1542年之前的某个时间,他在卫藏地区接受训练之后回到了古格^⑤。当时他只是一名苦行者(*bya bral*),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上升成为国王的精神顾问,位至托林寺、洛当寺(Blo stangs)和香孜寺的宗教主持。他在达巴萨(Mda'pa sa, Dawa dzong, 达瓦宗)建立了札什伦布寺(Bkra shis lhun po monastery)^⑥。1546年,国王吉丹旺秋在香底巴的一些侍者陪同下,去了哲蚌寺('Bras spungs),并向孩童三世达赖喇嘛致敬^⑦。他几年之后逊位,1555年,他再次拜访三世达赖喇嘛,这次是由香底巴本人陪同,当时香底巴被选为藏地伟大的札什伦布寺的第七任堪布,并有了头衔班钦^⑧。

吉丹旺秋对格鲁派的赞助并未阻止他保护古老的、当时已有点衰败的止贡派在凯拉斯的修行地。国王及其布让首领(*sde pa*)索南饶丹(Bsod nams rab brtan)帮助多真(*rdor 'dzin*)修复了各种建筑,还有一些地产也得到恢复^⑨。

随着芒域贡塘王国的衰败,婚姻联盟也终止了。一位名叫贡却桑姆(Dkon mchog bzang mo)的古格公主,显然是吉丹旺秋的女性亲戚,与贡塘统治贡噶南杰德(Kun dga' rnam rgyal lde)结婚。她丈夫死后,她成为他侄子赤·扎西贝巴(Khri Bkra shis dpal 'bar)的妻子。她于1555年被杀死^⑩。

① Elias(伊利斯)1895: 451—457。

② VS, f. 220a. 图齐在一份跋记中发现这位国王被提到, Tucci(图齐)1935: 177—178。

③ 《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a, ff. 1—28。

④ VS, f. 160b. DL5—a, Ca, f. 16a。

⑤ 香底巴告知了第二世达赖喇嘛他的离开, 见《第二世达赖喇嘛全集》Rī, f. 29a。

⑥ 关于香底巴, 参见伯戴克收集的信息, Petech 1988b: 385, 注释 95。达瓦宗札什伦布寺在图齐 1937 年的著作中有描述, 见 Tucci 1937: 149—150。

⑦ DL3, f. 28b。

⑧ DL3, f. 40a—b。

⑨ Ti-se, 39, f. 33a。

⑩ KT 1748, 138 和 139。《第二世达赖喇嘛的全集》中发现了一封第二世达赖喇嘛给这位王后的信, Rī, f. 55b。

吉丹旺秋(的统治似乎标志着古格的历史臻至辉煌。王国的经济没有受到米热·海达快速进出的破坏,从对阿里扎仓的建设所投入的大量物资来看,其经济显然是繁荣昌盛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能是羊毛制品,后来成为王国的支柱产业。凯拉斯北部荒漠地区,即现在的托家隆(Thok Jalung)的金田,是19世纪黄金挖掘的主要中心^①。

下一任国王阿吉旺秋(Ngag gi dbang phyug)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名字。或许他的统治见证了另一次来自古格西邻的劫掠。拉达克王扎西南杰(Bkra shis nam rgyal,约1555—1575年)据说曾经“征服了从普日(Purig)到卓雪(Gro shod)的一切,带回家无数的马群”^②。卓雪是藏布河上游地区,从玛域(Mar yum)山口至擦曲(Tsa chu)的交界处。这条信息过于模糊,我们不能据此理解这次入侵到底对古格的影响有多大(如果有的话),看起来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财物劫掠。

国王的弟弟协饶沃色(Shes rab 'od zer)担任古格最重要的寺院的宗教首席职位,即洛当寺、且噶寺(Bye dkar)、南杰孜寺(Rnam rgyal rtse)(在东嘎)、芒囊寺、多香寺(Do shang)、香孜寺^③。

然后是南喀旺秋(Nam mkha' dbang phyug)即位。他的弟弟洛桑丹贝尼沃(Blo bzang bstan pa'i nyi 'od)资助了哲丹(Bre ldan)的侧殿,含有17尊神祇的曼荼罗^④。他拥有托林寺、洛当寺和达巴萨札什伦布寺(达瓦宗)的堪布职位。这幅总的画面直到王国结束才改变。国王的弟弟,通常称为“拉尊”,通过就任所有重要寺院的堪布控制了格鲁派。考虑到寺院集团的财富和影响力,这种安排很有必要。

这一时期见证了另外一场来自拉达克的更为严重的入侵。国王才旺南杰(Tshe dbang nam rgyal,约1575—1595年)声称年轻时就征服了所有国家,东边远至昂仁(Ngam ring 北拉堆的首府),包括洛波、布让、古格等,除了尼泊尔西部的久姆拉(Jumla)和纽提(Nyung ti, Kulu 库鲁)。他带走了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作为人质,将他的代理人安置在他们的城堡里,“这样扩大了芒域的领土”。古格必须每年上贡300盎司黄金,一些白银,100头三岁的绵羊,1匹战马,10个革制皮包。这些是永久的贡赋,由此古格成为拉达克的一个属国^⑤。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持久,因为在接下来巴勒蒂(Balti)首领阿黎·米尔(Ali Mir)的统治期间,拉达克遭受了重大灾难^⑥,古格遭受的屈辱也预示了其在不久的将来独立的终结。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位古格王的名字以及事情发生的年代,古格王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属国的地位。

赤·南喀旺秋的王位由他的儿子赤·尼玛旺秋(Khri Nyi ma dbang phyug)继承,继任他位置的又是赤·扎贝旺秋(Khri Grags pa'i dbang phyug)^⑦。另一个儿子是拉尊·洛桑·益西沃(Lha btsun Blo bzang Ye shes 'od),他按常理成为宗教领袖。

① 早在15世纪,古格在羌巴叶茹(Byang pa Gyas ru)任命了一名“金田大师”(gser dpon),见 THST, f. 136a。关于金田及工作的生动描述,参见 Elias (伊利斯) 1895: 421。关于19世纪的洗金业,参见 L. Boulnois 1983。

② LDGR, 37. 23—24。

③ 关于这些寺院的辨识,见 Tucci (图齐) 1971b: 478—488。

④ 关于 VS 这段的阐释,见 Yamaguchi (山口瑞凤) 1992: 73, 注释 12。

⑤ LDGR, 38. 8—11。

⑥ 关于阿黎·米尔以及他推翻拉达克政权,参见 Petech (伯戴克) 1977: 33—34。

⑦ 图齐出版的一份跋记中提到了这位国王,见 Tucci 1935: 177。

下一任国王是赤·南杰扎巴桑波 (Khri Rnam rgyal grags pa bzang po), 他与他的伯父拉尊一起翻新了札不让的洛当寺。伯侄二人向一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1570—1662年) 发出了邀请, 他于1618年7月7日抵达托林, 受到了觉卧达波 (*jo bo bdag po*, 即国王——译注) 的极大礼遇。在国王及其伯父与哥哥的陪同下, 班禅也访问了穆噶寺 (Mu dkar, 即多香 Do shang)、芒囊寺、达巴·札什伦布寺和香孜寺。拉尊, 班禅称他为“夏仲却杰” (*zhabs drung chos rje*, 意为“法主阁下”——译注), 被认为是王国的宗教领袖 (*bstan pa'i bdag po*)。这只不过是對他已有地位的認可, 他是托林、洛当、南杰孜 (Rnam rgyal rtse)、多香、达巴·札什伦布和香孜等寺的堪布。10月2日, 这位尊贵的高僧离开古格, 绕着凯拉斯朝圣, 然后回到了札什伦布寺。这位格鲁派第二高位的领袖人物的到访是正在没落的王国最后的辉煌与荣光^①。

接待班禅的国王东道主的位置由赤·扎西·札巴德 (Khri Bkra shis Grags pa lde) 继承^②, 他1622年时已经在位。他的叔祖拉尊, 尽管作为宗教领袖人物的官方位置已经正式转交给了国王的哥哥, 但他仍然是幕后的强权人物, 直到1626年逝世。

在他统治期间, 基督教传教士安托尼奥·德安德德 (Antonio de Andrade, 1580—1634年) 在他的命令下在札不让成立了一个教团。在善良的国王的保护下, 尽管两位拉尊都反对, 但还是兴盛了几年。从基督教神父们的信件和交往中, 我们得到了古格王国灭亡前不久的一幅鲜活的、尽管是有偏见的画面。他们对于当地经济和商业的描述值得关注。每年有一支商队将中国内地的丝绸、瓷器和茶等从卫藏带到札不让。这一组织在随后的政治变动中幸存了下来^③。

当时, 悲剧最后一场行动的大幕已经掀起, 主要的演员是拉达克诸王中最伟大的森格南杰 (Seng ge rnam rgyal, 1610年或1616—1642年)。德安德德神父的一封信中提供了他征服古格的细节。由于王后在关押期间失去理智, 古格王与拉达克统治者的姐姐另外缔结了婚姻, 婚礼仪式由代理人操持, 但是当新王后在去往夫家的路上, 距札不让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 国王突然禁止她前行并将她送回了拉达克。当然, 这一行为被森格南杰看作是無法忍受的侮辱, 他立即宣布发动战争。冲突拉锯式地持续了很长时间, 致使农田无法耕作, 金矿无法开采。3名属地头领的叛乱又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藏文文献告诉我们的故事稍有不同。拉达克—古格的冲突在1622年就已经开始, 在拉达克达那 (Stag sna) 竹巴寺堪布穆增 (Mu rdzing) 的调停下, 达成了停战协议, 冲突停止。但休战并未持续太久, 部分是因为竹巴僧侣抢劫了圣湖—神山的修行处, 经济变得越来越困难。1630年, 当国王病重时, 一些属地在曲木尔提 (Chumurti) 头领的率领下, 发起叛乱, 召请拉达克王, 向其奉上古格王冠。森格南杰被围困在札不让。首席喇嘛 (即拉尊) 建议国王 (*jo bo bdag po*) 在保持王国作为附属国的条件下投降, 国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但是后来对方背信弃义, 撕毁承诺, 国王、其儿子和哥哥都被关进监狱, 带到列城。部分札不让的守城部队仍然作了抵抗, 获准自由离开去往卫藏。王室家族成员后来获准迁往拉萨,

① PC1, ff. 63b—65a; 参见 VS, f. 220b。

② Ti-se, 40, f. 33b 告诉我们古格王扎西衮, 赤·札巴扎西和其他人赞助了止贡派修行处。赤·札巴扎西当然等同于赤·札西札巴, 但扎西衮不知是谁。

③ 关于札不让教团的基本研究仍然是 Wessels 1924: 43—119; 还有 Toscano 1977: 334—423。

古格王朝最后一名男性后裔逝世于 1745 年。随着他的两个女儿的过世，这个家族消亡了^①。

七、古格和布让后来直至今天的发展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古格和布让的故事完全是地方性的，不太令人感兴趣。新的主人信奉竹巴派，对格鲁派僧侣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对基督教团也绝不友善。神父弗朗西斯科·德·阿则宛多（Francisco de Azevedo）想争取更好的条件，前往列城（1631 年），但完全失败。1635 年，教团不得不撤走，1640 年试图重新开放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最后一名基督兄弟被拘留在札不让直至逝世。

森格南杰通过一系列的侦察行动抵制蒙古部族和藏地古格难民的劫掠，确保他新的治地的边界安全。正是在一次远征探察归来的途中，他于 1642 年 11 月逝世于汗勒（Hanle）。

他 3 名尚存的儿子们之间发生了争执，之后，他的遗孀王后暂时摄政，再后，1647 年，王国分裂了。德丹南杰（Bde ldan nam rgyal, 1642—1694 年）成为拉达克王；第三子得到了桑噶和斯比蒂；第二子曾经受戒为僧，名字叫因陀菩提（Indrabodhi），他得到了古格，是在拉达克王的宗主治下；遗孀王后保持了布让作为她的个人财产直至她 1650 年逝世^②。

关于因陀菩提长期统治下的古格的情况，我们没有信息，只知道拉达克王是一名竹巴派的忠实信徒，采取措施限制古格格鲁派寺院僧人的数目和地产。当然，这激起了来自达赖喇嘛政府和其和硕蒙古保护者的反对，起初只是外交层面的。17 世纪，双方的关系恶化，1679 年，五世达赖喇嘛决定发动战争。

蒙藏军队在蒙古将军噶丹才旺贝桑（Dga' ldan tshe dbang dpal bzang）的领导下，进入圣湖地区，在热拉卡玛（Ra la Mkhar dmar）打败了拉达克的先进的军队，并追击残军远至今天的拉达克边界。其他的幸存者在达拉卡它（Dtag la mkhar, Taklakoth）、札不让（Rtσα brang）和扎西岗（Bkra shis sgang）的城堡中躲避，但是 1680 年冬天被迫投降。整个古格和布让纳入了拉萨政府的统治之下。因陀菩提逃亡，我们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他的桑噶防御工事，先是抵制蒙古人，后来是抵制库鲁军。

战争持续了好几年。最后，在克什米尔统治者末胡（Moghul）的干预下，他们的军队击退了蒙藏联军，拉达克免遭毁灭。

1683/1684 年，在六世竹巴转世米帕旺波（Mi pham dbang po）的调停下，拉萨和拉达克之间达成了和平，难分胜负。西部西藏的羊毛贸易由克什米尔宣布垄断，这样就排除了拉达克的介入。每年来自拉萨的商队（*cha pa*）则从事着一般的贸易，德安卓德在 1625 年已经注意到这种古老的习俗也确认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拉达克的代表团每三年一次送贡物到拉萨，主要的目的是贸易。阿里三围的税收仍由竹巴派保留，但实际上掌控在拉萨地方政府手里，他们用西藏中部地区三处地产的税收补偿竹钦（'Brug chen）。

^① 关于拉达克对古格的征服以及古格王室家族的命运，参见 Petech（伯戴克）1977：41—45 以及那里引用的文献。

^② 关于森格南杰王国的分割，参见 Petech（伯戴克）1977：58—59。因陀菩提 1651 年 11 月从托林寺签署的一个文件由 Schuh 出版，见 Schuh 1985：57—59。

以这种相当迂回的方式,古格和布让被拉萨兼并^①。在下列的条款下,达赖喇嘛的政府承认其新的统治。古格置于居住在札不让的宗本的控制下。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托林寺继续是古格主要的中心,其堪布由拉萨政府从哲蚌寺的僧人中任命。布让的变化更彻底。杰底卡失去了其作为地区总部的地位,布让的宗本住在达拉卡它(Stag la mkhar, Taklakoth)。1687年之前不久,在达拉卡它附近建立了1座名叫歇培林(Bshad 'phel gling, Simbiling 或 Shimbuling)的新寺院作为新的宗教中心,堪布由拉萨政府从色拉寺的僧人中任命^②。其他两名宗本住在如雪(Ru shod, Rupshu)和达瓦宗(Mda' ba rdzong, 现在通常拼作 Zla ba rdzong; Dawadzong)。4名宗本受到西部西藏首席长官(sgar dpon, 噶本)的监管和控制。他住在圣湖西边一带,他的总部夏天在噶雅萨(Sgar dbyar sa, Gartok 噶托),冬天在噶衮萨(Sgar dgun sa, Gargunsa 噶贡萨)。

拉达克的损失还包括斯比蒂(只是暂时的)和上部金瑙尔。后者被割让给了巴夏哈(Bashahr)的热贾(Rāja),他曾和拉萨的军队合作。因此,古老的古格王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古格和布让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和文化衰退,图齐1933—1935年的旅行记录提供了证据。没有什么事件打破这一地区昏睡般的宁静,只有一次例外。1835年,卓热渥·辛将军(Zorawar Singh)为古拉·辛(Gulab Singh)——查谟(Jammu)的首领、后来是克什米尔的大王(Mahārāja),征服了拉达克。1841年,卓热渥·辛向噶本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但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以六千人的军队入侵西藏西部。8月23日,他进入札不让,达赖喇嘛的政府迅速反应,11月14日从拉萨派出了一支大部队,在达拉卡它(Taklakoth)附近的多药(Do yo)遭遇了由于不适应严寒的气候而变得衰弱不堪的查谟军队的主力。卓热渥·辛英勇战至最后,兵败被杀,他的军队也被消灭。得胜的藏军继续进军,侵入了拉达克,但受到阻击,被包围了起来,不得不投降。1842年9月,双方的军事将领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战争宣告结束,备忘录确认了老的边界和贸易规则^③。

布让只是很少地卷入了藏人和尼泊尔人之间1855/1856年的冲突。尼泊尔政府提出的一份领土声明中放弃了达拉卡它区。1855年4月,一支小的尼泊尔军队进入布让,破坏了古老的吉地卡(Jidikhar)城堡,但是在这次不重要的战争中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④,和平条约恢复了先前的境况。

卓热渥·辛和尼泊尔人(主要是前者)对寺院和城堡造成了破坏,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破坏尤甚。古老的文化中心如札不让和托林寺受到影响,几座可追溯至仁钦桑布时期的殿堂也不复存在。

最后应该说一说斯比蒂。森格南杰与古格的古老亲密联系保持了几个世纪。当拉达克王国被分给他的3个儿子后(1647年),桑噶和斯比蒂被分给了年幼的德却南杰(Bde mchog nam rgyal),他在1666年时仍然在世。他的后裔继续统治桑噶,但斯比蒂似乎回到了拉达

① 关于1679—1684年的战争以及最后达成的条约,参见Petech(伯戴克)1977: 71—80。

② DL5, Nga, f. 277a—b; DL5—a, Ca, f. 226。

③ 关于卓热渥·辛在阿里的行动,达他有很好的记录,见Datta 1973: 131—144。也可参见Petech(伯戴克)1977: 145—146。

④ Pranavananda 1949: 135n (1854年应该更正为1855年); Rose 1971: 110; ZHWA II: 22—23。

克松散的宗主管理下。1684年，拉萨政府正式取得了斯比蒂，并任命了长官，但很快又丧失了这一地区，这一河谷又归于拉达克的治下，期间只有短暂的例外（1729—1758年），其时，普日（Purig）王扎西南杰（Bkra shis rnam rgyal）的霸主地位得到承认^①。

对斯比蒂的控制总是不明确，其长官起初是噶噶（ga ga），后来是诺诺（no no），被认为是拉达克的八大封地之一。拉达克王国被废除后，诺诺的自治权也逐渐缩减。但是他们仍然延续到了今天，尽管没有了管理权和司法权。

1846年，斯比蒂从拉达克分离了出来，成为英印的领地，今天它是印度喜马偕尔邦的斯比蒂—拉胡区的一部分。

附录 A：噶逻（Gar log）的问题

很久以前（1950年），霍夫曼（H. Hoffmann）就将噶逻（Gar log）辨认为中亚的葛禄（Qarluq），并立刻被无条件接受。从语言学的观点，这一判定是肯定的，但是从历史学的方面，我们不得不进行区别对待，霍夫曼本人也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噶逻这个名字首次出现于9世纪。它出现在关于一位僧人的传说中。这位僧人为躲避朗达玛的迫害，从拉萨向上部阿里逃亡，经过了噶逻国，抵达了霍尔（Hor, Uighur）^②。这发生在9世纪40年代。当时，将噶逻等同于葛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地理的角度都没有困难。

最早的文献中没有关于益西沃被关押在狱中并死于噶逻的记载^③，它最早出现于《红史》中（1346/1368年），接着《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和后来的文献中也有了类似的记载。在一组相当早的资料中，即《西藏王统记》（1364/1368年）、《汉藏史集》（1434年）和两部阿底峡的最早的传记（《广传》（*Rnam thar rgyas pa*）和《普传》（*Rnam thar yongs grags*））中，叙述的故事几乎相同，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没有提到噶逻，故事情节中的绑匪是一些异教徒（*mu stegs pa*），一个相当模糊的词语，只有宗教上的意义，没有民族上的意义。从一开始，故事只提到益西沃在去印度或印度边境筹集资金以邀请一名印度学者时被俘。因此我们应该去印度方面寻找益西沃的噶逻以及12世纪对古格的破坏。

异教徒是指激烈地反对佛教者，正如霍夫曼已经指出的那样，看起来更像是狂热的穆斯林，而不是印度山地的部落。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异教徒”和噶逻，一些来自印度的穆斯林，都等同于已知的（还有后来所知的）土耳其（*Turuška*）这个词。

对于这一等同，我们有相当古老的证据。吉丹贡布（'Jig rten mgon po, 1143—1127年）曾打算去噶逻国劝化那里的土耳其人（《吉丹贡布传》^④，79a叶）。达巴玛布（*Dam pa Dmar po*, 11世纪晚期）据说用法术阻止了噶逻的一次威胁性侵犯^⑤。喀且班钦在西藏期间（1204

① Petech (伯戴克) 1977: 78—79。

② BTCB, 201; HD, 41。

③ SNTM, DEU/1—2。

④ 歇饶迥乃（*Shes rab 'byung gnas*, 1187—1241年），《法王吉丹贡布十方三世传记》（*Chos rje 'Jig rten mgon po 'i rnam thar phyogs bcu dus gsum ma*），收入《止贡法王吉丹贡布仁钦贝文集》，新德里 1961, 1。

⑤ BA, 1029。

—1214年), 摩揭陀曾遭到嚙逻入侵^①。对恰译师而言 (Chag Lotsawa, 1197—1264年), 嚙逻是土耳其人的一种, 他们的名字反复出现, 用于指代那些13世纪30年代骚扰比哈尔, 主要是菩提伽耶、那兰陀等地的穆斯林劫掠者, 他们还多次威胁米提拉 (Mithila) 的首府 Simraongarh^②。邬坚·森格贝 (U rgyan Seng ge dpal, 1230—1309年) 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 不得不祈求护法神的帮助以躲避嚙逻的军队; 他第二次去的时候 (1261年), 见证了斯里兰卡国王和其他统治者发起的对遭到嚙逻人破坏后的菩提伽耶的修复工作^③。

在13世纪, 嚙禄跟我们的问题不再相关。他们仍然生活在伊里 (Ili) 河谷, 他们古老的露营地并被分为两部分: 阿力麻里 (Almaliq) 嚙禄, 后来臣服于成吉思汗 (Jinghiz Khan); 和回鹘的 (或臣服于回鹘的) 嚙禄。1141年, 当古尔汗 (Gur khan) 在可塔万 (Qatvan) 成功控制塞尔柱 (Saljuq) 后, 将他们的影响拓展到远至撒马尔干 (Samarkand) 地区, 但即使那样, 他们也没有和喜马拉雅地区发生联系^④。

总而言之, 13世纪的嚙逻是突厥来源的穆斯林, 被德里所谓的玛木鲁·苏丹 (Mamluk Sultans) 统治。但是, 我们不能将他们断定为11世纪30年代俘虏益西沃的嚙逻人, 除非我们想象1037年由伽色尼 (Ghazna) 的玛穆德 (Mas'ud) 率领的印度远征军随便干下了这桩事。1009年至1044年间, 一支伽色尼守卫军队驻扎在岗热 (Kangra), 但他们只不过是据有堡垒, 且只是出于被动。至于12世纪破坏布让王国的嚙逻, 目前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判定。

附录 B: 彭雅玛拉 (Punyamalla) 的继任和都鲁 (Dullu) 碑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注意到的, 根据西藏的传统, 索南德 (Bsod nams lde) 是布让的国王, 当那伽德瓦 (Nāgadeva) 的一支消亡后被推举就任亚泽王位, 他将名字翻译为彭雅玛拉。

都鲁帕夏斯蒂的版本很不相同, 值得仔细讨论。碑正面记载的统治者用家族的字“—帕拉” (-pāla) 来结尾。起初, 他们并没有地方化。我们不得不等到 Varagajamahīpāla 名单上第14任统治者才得到信息, 他居住在 Goha 区 (viśaya), 可能是现在 Garjyān Koṭ 或久姆拉地区 Madhyavarti Aśi 分区 (darā) 的 Gothichaur^⑤。他打败了 Cīna 的首领 (nrpati)^⑥, 与贾哇 (Jāva), 即久姆拉镇, 建立了一种尚未明确的联系。他的继任者 Viśvapāla, 统治 Jhumakāra 区, 或许是 Tibrikot 分区的 Juphal 或 Jhumchaur。然后在传承上有个明显的断层,

① KPGT, II, 492。

② CHAG, ff.8b, 10b, 11a, 12b, 34b, 35a, 38a。

③ KPGT, II, 482。

④ Barthold 1968: 326, 333—334; Buell 1992: 16。

⑤ 这个和接下来的判定是由 Naraharinath 1955年提出的。关于久姆拉19个分区的名单和每个分区所包含的村庄, 参见 Naraharinath 1955: 13—19。

⑥ 至于图齐的 Cīna-nrpatīn, Naraharinath 读作 śrīla-nrpatīn, 没有意义。关于 Cīna, 作为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地名属于古老的象雄, 见 Tucci 1956: 103 和 Tucci 1971a: 548—550。但是图齐将 Cīna 比定为 Kunawar 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资料来源, 一份写于 1844/1847 年的苯教神山导论, 同时由 Namkhai Norbu 出版。GTS, 54 中说象雄孜那 (Tsi na) 是且玛雍仲 (Bye ma g.yung drung) 河谷, 藏布河的支流之一。因此 Cīna 就对应于 Gro shod, 位于玛玉 (Mar yum) 山口东边的地区, 这由一条行间的注释得以确认: Gro shod zer (出处同上, 20 页)。这一判定在地理上是可能的, 因为 Gro shod 刚好位于久姆拉的北部, 超出了喜马拉雅的划分。

因为下一任国王吉哇帕拉 (Jīvapāla) 据说出生于 Ṭhi 贵族家中 (Ṭhi narendrakule jāto)。因为他的新家族名字被认为是格拉 (Gelā) 的, 目前在 Cārsāti Bārabīs 分区上部和下部格拉的两个孪生村庄。他儿子的名字没有给出, 我们只知道他 (也) 采用了称呼圣·贾哇 (Śrī Jāva) (之主), 即久姆拉。他的儿子是彭雅玛拉 (Punyamalla), 他与萨库娜玛拉 (Śakunamālā) 结婚, 她可能属于那嘎惹伽 (Nāgarāja) 王朝。“从这一对开始, 第一任圣·玛拉 (Śrī Malla) (统治者) 得以传承下去”。然后题记 (背面) 告诉我们“由于那嘎惹伽没有后裔留下, 格拉的彭雅玛拉登上王位”。

由于格拉肯定与布让不同, 因此似乎不太可能调和这两份记录, 至少, 这是我在 1980 年时的结论。不过, 我认为, 现在可以试着来克服这个差异。正如已经注意到的, 《科迦寺导读》有一个显然是统治布让的国王名单, 他们的名字是以王室称呼“赤” (Khri) 开头的。如果我们将这个词解读为题记中的 “Ṭhi narendrakula”, 用来指代布让的 “赤” (Khri) 统治者 (语音上看起来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 一位布让王在某一时期吞并了格拉地区, 采用了当地的结尾词 “—帕拉” 以缓和征服地人民的情绪。他的孙子, 《科迦寺导读》中的赤·扎西索南德应该就是继承亚泽王位的那位。

当然, 这一解释听起来相当复杂, 也有点牵强附会, 但是我找不到能够调和这两种版本的其他方法。

参考文献

藏文史籍:

BA: 郭·迅鲁伯 (’Gos Gzhon nu dpal, 1392—1481 年), 《青史》(*Bod kyi yul du chos dang chos smra ba ji ltar byung ba’i rim pa, Deb ther sngon po*) (完成于 1478 年), 英译本: *The Blue Annals*, 两卷本, 罗列赫译 (G. N. Roerich), 加尔各答, 1949—1953 年。

BCLK: 《菩提道灯细疏》(*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i dka’ ’grel*),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 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 (103 卷, 丹珠尔·经疏·中观部 IX, no.5344), 铃木大拙编 (Daisetz T. Suzuki), 东京-京都, 1957 年。

BCLS: 《菩提道灯》(*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 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 (103 卷, 丹珠尔·经疏·中观部 IX, no.5343), 铃木大拙编, 东京-京都, 1957 年。

BPP1: 《菩提道灯——阿底峡教导著作的藏文传承》(*Bodhipathapradīpa. Ein Lehrgedicht des Atiśa [Dīpaṃkaraśrījñāna] in der tibetischen Überlieferung*), 《亚洲研究》第 59 卷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59), 赫尔默特·艾米尔编 (Helmut Eimer), 韦斯巴登, 1978 年。

BPP2: 《阿底峡的道灯论》(*A Lamp for the Path and Commentary. By Atiśa*), 理查德·谢伯翻译、注释 (Richard Sherburne), 伦敦等, 1983 年。

BTCB: 布顿·仁钦珠 (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 年), 《布顿佛教史》之第二部分《印藏佛教史》(*Bde bar gshegs pa’i bstan pa rigs byed chos kyi ’byung gnas gsung rabs rin po che’i mdzod*, 也称为 *Zhva lu pa’i chos ’byung*) (1322 年), 《佛教材料》第 19 卷

(Materialien zur Kunde des Buddhismus 19. Heft), E.Obermiller 译 (部分), 海德堡, 1932 年。

BTNT: 扎蔡巴·仁钦南杰 (Sgra tshad pa Rin chen rnam rgyal, 1318—1388 年), 《布顿大师传记》(*Chos rje thams cad mkhyen pa Bu ston lo tsa ba'i rnam par thar pa*, 1355/1356 年),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第 34 卷 (*Serie Orientale Roma XXXIV*), 荣格编、译 (D. Seyförd Ruegg), 罗马, 1966 年。

BZH: 《拔协》(*Sba bzhed rgyas pa.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 yas: Sba bzhed*), 《汉学高级研究院出版系列, 文本和写本, I》(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Textes et Documents, I), 石泰安编 (R.A.Stein), 巴黎, 1961 年。

CBM: 多杰才旦 (Rdo rje tshe brtan) (1977), 《大译师仁钦桑布及其随后的化身的传记材料集成, 斯比蒂吉寺收藏的写本的再版》(*Collected Biographical Material about Lochen Rin chen bzang po and his Subsequent Reembodiments. A reproduction of 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library of Dkyil Monastery in Spiti*), 新德里。

CHAG: 却贝达姜 (Chos dpal dar dpyang, 13 世纪), 《恰译师·却吉贝传记》(*Bla ma'i gsung dri ma med pa bsgrigs pa, 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 《一名藏族僧侣朝圣者》(*A Tibetan Monk Pilgrim*), 原始的藏文文本由罗列赫释读和翻译, 巴特那, 1959 年。

DEU/1: 堪巴·德乌 (Mkhas pa Lde'u), 《汉藏教法源流史广记》(*Rgya bod kyi chos 'byung rgyas pa*, 也称为《德顿教法源流史》*Lde ston gyi chos 'byung*, 1260—1261 年?), 《雪域智藏》(*Gangs can rig mdzod*), 3, 恰白·次旦平措编, 拉萨, 1987 年。

DEU/2: 德乌·觉色 (Lde'u Jo sras), 《德乌教法源流史》(*Chos 'byung chen mo bstan pa'i rgyal mtshan*, 也称为 *Lde'u chos 'byung*, 1230—1240 年?), 却卓编 (Chos 'dzoms), 拉萨, 1987 年。

DL3: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 年), 《三世达赖喇嘛传》(*Rje btsun thams cad mkhyen pa Bsod nams rgya mtsho'i rnam thar*), 《五世达赖喇嘛文集》, 卷 Nya/3.

DL5: 《五世达赖喇嘛 (1617—1682 年) 自传》(*Za hor ban de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di snang 'khrul pa'i rol rtsed rtogs brjod kyi tshul du bkod pa*), 《五世达赖喇嘛文集》, 卷 Ka-Kha-Ga.

DL5-a: 第悉·桑结嘉措 (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 1653—1705 年) 继续完成《五世达赖喇嘛自传》(*Drin can rtsa ba'i bla ma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thun mong phyi'i rnam thar* 等), 《五世达赖喇嘛文集》, 卷 Ka-Kha-Ga.

DMSM: 班钦·索南扎巴 (Pañ chen Bsod nams grags pa, 1478—1554 年), 《新红史》(*Rgyal rabs 'phrul gyi lde'u mig gam Deb ther dmar po gsar ma, 1538*), 《新红史 Vol.I, 藏文文本、文本校订、英文翻译以及含有两份小年表的附录》,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第 24 卷 (*Serie Orientale Roma XXIV*), 图齐编、译, 罗马, 1971 年。

DPST: 《净诸恶趣续》(*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Tantra*), 梵、藏文本带介绍、英语翻译和注释, 斯科罗夫斯基 (T. Skorupski) 编, 新德里-瓦腊纳西-巴特那, 1983 年。

GBYT: 达仓巴 (Stag tshang pa Śrībhūtibhadra), 《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 mkhas pa'i dga' 'byed*, 1434 年), 2 卷, 廷布, 1979 年。

GDK:《怛特罗集成》(*Rgyud sde kun btus*), 绛央·洛德旺波('Jam dbyangs Blo gter dbang po) 在其上师绛央·堪孜旺波('Jam dbyangs Mkhyen brtse'i dbang po) 启示下编成, 根据俄尔寺达则仁波且(Thartse Rimpoche) 的德格木刻版进行了影印再版, 卷 IV, 新德里, 1971 年。

GPGT: 萨迦巴·扎巴坚赞(Sa skya pa 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 年), 《西藏王统》(*Bod kyi rgyal rabs*), 《萨迦全集》(*Sa skya bka' 'bum*) (索南嘉措编, 15 卷, 藏文文库 Bibliotheca Tibetica I/1-15, 东京, 1968—1969 年) 卷 Ta, ff.196b—200a。

GR1: 萨迦巴(bla ma dam pa, 圣喇嘛)·索南坚赞(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12—1375 年), 《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 1368 年), 索罗森翻译、注释(P.K.Sørensen) (《亚洲研究》第 128 卷,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128), 韦斯巴登, 1994 年。

GR2: 萨迦巴(圣喇嘛)·索南坚赞, 《西藏王统记》(1368 年), 北京, 1981 年(参见索罗森 1994 年译本, 基于对该文献的校注, 尚未出版)。

GTS: 噶如·旦增仁钦坚赞(Dkar ru Bstan 'dzin Rin chen rgyal mtshan, 生于 1801 年), 《岗底斯目录: 底斯神山和玛旁蓝湖的苯教故事》(*Gangs Ti-se'i dkar chag [1844/1847]: a Bon po story of the sacred mountain Ti-se and the blue lake Mapang*),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第 61 卷(*Serie Orientale Roma LXI*), Namkhai Norbu 和 R. Prats 编辑并翻译(部分), 罗马, 1989 年。

HC: 巴那(Bana), *Harsacarita*, 科宛和托马斯译(E.B. Cowell & F.W.Thomas), 新德里—瓦腊纳西—巴特那, 1961 年。

HD: 蔡巴·贡噶多吉(Tshal pa Kun dga' rdo rje, 即司徒·格哇洛卓 Si tu Dge ba'i blo gros) (1309—1364 年), 《红史》(*Deb ther dmar po rnams kyi dang po Hu lan deb ther*) (1346 年, 完成于 1363 年), 东嘎·洛桑赤列注释, 北京, 1981 年。

KHGJ: 《克珠杰传记》(*Mkhas grub thams cad mkhyen pa'i rnam thar mkhas pa'i yid 'phrogs*), 《克珠杰文集》, 卷 Ka/1。

KPGT: 巴卧·祖拉(陈瓦真巴)(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 'dzin pa], 1504—1566 年), 《贤者喜宴》(*Dam pa'i chos kyi 'khor los bsgyur ba rnams kyi byung ba gsal bar byed pa mkhas pa'i dga' ston*, 1545—1565, 也称为《洛扎教法史》*Lho brag chos 'byung*), 钱德拉编, 4 卷, 新德里, 1959—1962 年。

KT 1745: 噶托(仁真)·才旺诺布(Kaḥ thog [rig 'dzin] Tshe dbang nor bu, 1698—1755 年), 《西藏史籍五部》(*Rgyal ba'i bstan pa rin po che byang phyogs su 'byung ba'i rtsa lag Bod rje lha btsan po'i gdung rabs tshig nyung don gsal yid kyi me long (1745). Bod kyi lo rgyus deb ther khag lnga*) (Gangs can rig mdzod, 9), 恰白·次旦平措编(Chab spel Tshe brtan phun tshogs), 第 57—86 页, 拉萨, 1990 年。

KT 1748: 噶托(仁真)·才旺诺布, 《西藏史籍五部》(*Bod rje lha btsan po'i gdung rabs Mnga' ris smad Gung thang du ji ltar byung ba'i thsul deb ther dwangs shel 'phrul gyi me long*), (Gangs can rig mdzod, 9), 恰白·次旦平措编, 第 89—150 页, 拉萨, 1990 年。

LAL: 《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 P.L. Vaidya 编, Darbhanga, 1958 年。

LDGR: 《拉达克王统记》(*La dwags rgyal rabs*), 弗兰克编、译(A. H. Francke), 第

17—148 页, 加尔各答, 1926 年。

MLRP: Dur khrod nyul ba'i rnal 'byor pa rus pa'i rgyan can, 《米拉日巴传记》(*Rnal 'byor gyi dbang phyug chen po rje btsun Mi la ras pa'i rnam thar*), 《印度-伊朗专论 IV》(*Indo-Iranian Monographs IV*), J.W. de Jong.'s Gravenhage, 1959 年。

MS: *Mānasollāsa of Someśvara*, G.K. Shrigondekar 编, 卷 II, Borada 1939 年。

NEL: 奈巴·扎巴孟兰洛卓 (Nel pa Grags pa smon lam blo gros), 《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Sngon byung gi gtam me thog phreng ba* [1283]. *Nel pa Paṇḍitas Chronik Me tog Phreng ba*), 《西藏研究, 卷 1》(*Studia Tibetica, Band I*), 于伯赫编、译 (H. Uebach), 慕尼黑, 1987 年。

NGCB: 俄钦·贡却伦珠 (Ngor chen Dkon mchog lhun grub, 1497—1557 年), 《俄尔教法史》(*Ngor chos 'byung*) (*Dam pa'i chos kyi byung tshul legs par bshad pa bstan pa rgya mtshor 'jug pa'i gru chen*), 俄钦·贡却伦珠开始写于约 1550 年, 桑结彭措 (Sangs rgyas phun tshogs) 完成于 1692 年, Ngawang Topgay 据 Burmiok Athing 图书馆所藏 1705 年德格版的一个珍稀木刻版再版, 新德里, 1973 年。

NGNT: 俄钦·桑结彭措 (Ngor chen Sangs rgyas phun tshogs, 1649—1705 年), 《俄尔·贡噶桑波传记》(*Rgyal ba Rdo rje 'chang Kun dga' bzang po'i rnam par thar pa legs bshad chu bo 'dus pa'i rgya mtsho*) (1688 年; 大部分基于 1455 年穆巴钦波·贡却坚赞 [Mus pa chen po Dkon mchog rgyal mtshan, 1388—1469 年] 所作传记), 德格版。

NSP: 《究竟瑜伽鬘》(*Niṣpannayogāvalī*), 无畏护著 (Abhayakaragupta), 巴达恰里雅编 (B.Bhattacharya), 《Gaekwad 东方系列卷 160》(*Vol. CLX of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巴罗达 (Baroda), 1949 年。

NYANG: 阿达·娘饶 (巴坚)·尼玛沃色 (Mnga' dbag Nyang Ral [-pa can] Nyi ma 'od zer, 1124/1136—1192/1204?), 《教法源流·花蜜精粹》(*Chos 'byung me tog snying po'i sbrang rtsi'i bcud*, 也称为 *Rnying ma'i chos 'byung chen mo, mnga' bdag Nyang gi chos 'byung, Dam chos chos 'byung*, 约 1175—1190 年?), 柏林 Faksimile 写本 (*Staatsbibliothek,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s. or. 1640*) 《阿达·娘饶巴坚的教法源流花蜜精粹 (1136—1204)》, 《(西藏历史古迹) *Monumenta Tibetica Historica, Abteilung I: Scriptores, Band 3*》, R.O. Meisezahl. Sankt Augustin 1985。

PAKP: 白玛噶波 (Padma dkar po, 1527—1592 年), 《竹巴教法史》(*Chos 'byung bstan pa'i padma rgyas pa'i nyin byed* ['Brug pa'i chos 'byung][1575 年, 1580 年修订]), 钱德拉编 (L.Chandra), 新德里, 1968 年。

PC1: 洛桑·却吉坚赞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一世班禅, 1570—1662 年), 《自传》(*Chos smra ba'i dge slong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gyi spyod tshul gsal bar ston pa nor bu'i phreng ba*), 《一世班禅文集》, 卷 Ka/1。

Q: 《西藏大藏经》北京版, 大谷大学图书馆, 京都, 铃木大拙编 (Daisetz T. Suzuki), 东京-京都, 1955—1958 年。

RCZP: 古格·吉唐巴·贝益西 (Gu ge Khyi thang pa Dpal ye shes), 《仁钦桑布传》(*Byang chub sems dpa' lo tsā ba Rin chen bzang po'i 'khrungs rabs dka' spyad sgron ma rnam thar shel phreng lu gu rgyud*), 刊于斯奈尔格鲁夫和斯科如普斯基 (D.L.Snellgrove &

T.Skorupski), 《拉达克遗产》, 卷 2: 《桑噶和拉达克的石窟寺》, 第 85—116 页, 沃明斯特, 1980 年。

SKP: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Sa skya paṇḍita Kun dga' rgyal mtshan, 1182—1251 年), 《萨迦巴·扎巴坚赞传记》(*Bla ma rje btsun chen po'i rnam thar*, 刊于 *Mkhas pa rnams 'jug pa'i sgo*), 《萨迦全集》(索南嘉措编, 15 卷, 藏文文库 Bibliotheca Tibetica I/1-15, 东京, 1968-1969 年), 卷 Tha, ff. 288b-299b。

SM: 《成就法鬘》(*Sādhanamāla*), 巴达恰里雅编 (B.Bhattacharya), 《Gaekwad 东方系列卷 26 和卷 41》(*Vol. XXVI and XLI of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巴罗达, 1925-1928 年。

SNLG: (洛波堪钦) 索南伦珠 ([Glo bo mkhan chen] Bsod nams lhun grub, 1456-1532 年), 《自传》(*Rje btsun Bsod nams lhun grub legs pa'i 'byung gna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i rnam par thar pa*) (1514?), 东洋文库图书馆藏写本, 东京。

SNTM: 索南孜摩 (Bsod nams rtse mo, 1142-1182 年), 《佛法入门》(*Chos la 'jug pa'i sgo*, 1167 年), 《萨迦派全集》(索南嘉措编, 15 卷, 藏文文库 Bibliotheca Tibetica I/1-15, 东京, 1968-1969 年), 卷 Nga, ff. 263b-317a。

STTS: 《一切如来真实义摄经》(*Sarvatathāgatātattvasaṅgraha*), 梵文文本附介绍和曼荼罗插图, 钱德拉编 (Lokesh Chandra), 新德里等, 1987 年。

STTS-a: 《一切如来真实义摄经》(*Sarvatathāgatātattvasaṅgraha*), 一份出自尼泊尔的 10 世纪梵文写本, Facsimile 再版, 钱德拉和斯奈尔格鲁夫再版 (Śatapiṭaka 系列, 第 269 卷), 新德里, 1981 年。

THST: 阿吉旺秋 (Ngag gi dbang phyug), 《唐东杰布传记》(*Grub pa'i dbang phyug chen po lcags zam pa Thang ston rgyal po'i rnam par thar pa ngo mtshar kun gsal nor bu'i me long* (1588 年)。

Ti-se: 止贡巴·旦增却吉洛卓 ('Bri gung pa Bstan 'dzin chos kyi blo gros), 《两部关于底斯 (Ti se) 和拉契 (La phyi) 的藏文导读书》(*Gangs ri chen po Ti-se dang mtsho Ma dros pa bcas kyi sngon byung gi lo rgyus mdor bsod su brjod pa'i rab byed shel dkar me long*) [1896]. (《西藏历史古迹》monuments of Tibetan history, section 1: documents, vol. 4. Monumenta Tibetica Historica, Abteilung I: Scriptorum, Band 4), E. De Rossi Filibeck 编、译, 第 11—113 页, 波恩, 1988 年。

TSSM: 郭仓热巴·奈措让卓 (Rgod tshang ras pa Sne tshogs rang grol), 《藏宁嘿如迦传记》(*Gtsang smyon He ru ka phyogs thams cad las rnam par rgyal ba'i rnam thar rdo rje'i theg pa'i gsal byed nyi ma'i snying po*) (1547 年), 《后藏圣人生平》, 新德里, 1969 年。

VS: 第悉·桑结嘉措 (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 1653—1705 年), 《黄琉璃》(*Vaidūrya ser po*, 1692—1698 年, 藏文木刻本), 钱德拉版 (新德里 1960 年) 有许多缩写和遗漏, 要小心使用。

YLJB: (雅隆尊者) 释迦仁钦德 ([Yar lung Jo bo] Śākya rin chen sde), 《雅隆尊者教法史》(*Yar lung jo bo'i chos 'byung*, 1376 年), 成都, 1987 年。

ZHWA: 夏喀巴·旺秋德丹 (Zhwa sgab pa Dbang phyug bde ldan), 《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 2 卷, 噶伦堡, 1976 年。

外文期刊:

- AOH: 《匈牙利东方科学研究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BEFEO: 《法国远东研究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CAJ: 《中亚期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
EW: 《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
HJAS: 《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J: 《印度—伊朗杂志》(Indo-Iranian Journal)
JA: 《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
JSAB: 《孟加拉亚洲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JLABS: 《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ddhist Studies)
JRA S: 《亚洲皇家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IATS: 《国际藏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WZKS: 《维也纳南亚研究期刊》(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外文论著:

- Adhikary, S.M.(1988): 《卡萨王国: 中世纪的一个跨喜马拉雅帝国》(*The Khāśa kingdom: a transhimalayan empire of the Middle age*), 贾普尔-新德里。
- Barthold, W.(1968): 《蒙古入侵前突厥史》(*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伦敦。
- Berglie, Per-Arne (1980): 《达郭山和当热湖: 西藏宗教地理的一则研究》(*Mount Targo and Lake Dangra: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ligious geography of Tibet*), 刊于《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专辑》(*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M. Aris 和 Aung San Suu Kyi 编, 第 39—44 页, 沃明斯特。
- Boulnois, Lucette (1983): 《西藏的金粉和银币》(以 18 世纪为主)(*Poudre d'Or et Monnaies d'Argent au Tibet, principalement au XVIII^e siècle*), 巴黎。
- Buell, Paul D.(1992): 《早期蒙古在西伯利亚西部和突厥地区的扩张 (1207—1219 年): 一种重构》(*Early Mongol Expansion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urkestan, 1207—1219): a Reconstruction*), CAJ, 36, 第 1—32 页。
- Cech, K. (1992): 《苯教传统中的西藏宗教地理》(*A Religious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the Bon Tradition*), PIATS Narita 1989, 第 2 卷 (语言、历史和文化卷), S.Ihara 和 Z. Yamaguchi 编, 第 387—392 页, 东京。
- Datta, Chaman Lal(1973): 《拉达克和西喜马拉雅政治》(*Ladakh and Western Himalayan Politics 1819—1848*), 新德里。
- Eimer, Helmut (艾米尔)(1979): 《阿底峡传记》(*Rnam thar rgyas pa. Materialien zu einer Biographie des Atiśa [Dīpaṃkaraśrījñāna]. 1. Teil: Einführung, Inhaltsverzeichnis, Namensglossar. 2. Teil: Textmaterialien*)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67), 韦斯巴登。

Elias, N. (伊利斯) (1895): 《中亚末胡的历史》(*The Tarikh i 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英文版由 N. Elias 编, 附有校注、注释和地图, E. Denison Ross 翻译, 伦敦。

Jackson, David (杰克逊) (1976/1977): 《洛(穆斯塘)和阿里的早期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Lo [Mustang] and Ngari*), 《尼泊尔研究》(*Contributions to Nepalese Studies*), 4, 第 39—56 页。

Jackson, David (杰克逊) (1978): 《色日历史与附近上部噶利噶达克河谷的地方》(*Notes on the History of Se rib and Nearby Places in the Upper Kali Gandaki valley*), *Kailash*, 6, 第 195—228 页。

Karmay, Samten G. (桑木丹·噶尔美) (1972): 《西藏苯教史》(*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 《伦敦东方系列 26》(London Oriental Series, XXVI), 伦敦。

Karmay, Samten G. (桑木丹·噶尔美) (1980a): 《天喇嘛益西沃的法令》(*The ordinance of Lha Bla ma Ye shes 'od*), 刊于《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专辑》(*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M. Aris 和 Aung San Duu kyi 编, 第 150—162 页, 韦明斯特。

Karmay, Samten G. (桑木丹·噶尔美) (1980b): 《颇章喜瓦沃致西藏佛教徒的一封信》(*An Open Letter by Pho brang Zhi ba 'od to the Buddhists in Tibet*), 《西藏期刊》(*The Tibet Journal*), 5, 3, 第 3—28 页。

Karmay, Samten G. (桑木丹·噶尔美) (1988): 《大圆满法, 藏传佛教中的一种哲学和修行法》(*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in Tibetan Buddhism*), 莱顿。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85): 《图齐档案初步研究 1: 塔波寺杜康殿的年代》(*The Tucci Archive Preliminary Study, 1: Notes on the Chronology of Ta pho Dukhang*), *EW*, 35, 1-3, 第 11—41 页。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87): 《改革与复兴: 11 世纪印藏寺院研究》(*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A Study of Indo-Tibetan Monasteries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纪念图齐东方研究》(*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56. 3》(*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3*), G. Gnoli 和 L. Lanciotti 编, 第 683—702 页, 8 plates。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88): 《图齐档案初步研究 2: 西喜马拉雅寺院艺术中的佛传及其艺术渊源: 事迹一》(*The Tucci Archive Preliminary Study, 2: The Life of the Buddha in Western Himalayan Monastic Art and Its Indian Origins: Act One*), *EW*, 38, 1—4, 第 189—214 页。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89): 《巴米扬王国: 兴都库什的佛教艺术和文化》(*The Kingdom of Bāmiyān.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of the Hindu Kush*), 那不勒斯-罗马。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90): 《1989 年西部喜马拉雅考察: 1933 年图齐考察的回顾》(*The 1989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Himalayas, and a Retrospective View of the 1933 Tucci Expedition*), *EW*, 40, 1-4, 第 145—171 页。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91): 《图齐喜马拉雅档案》(*The Tucci Himalayan*

Archive), *EW*, 41, 1-4, 第 379—384 页。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94a): 《图齐喜马拉雅档案报告 2, 1991 年喜马拉雅尔邦考察》(*The Tucci Himalayan Archive Report, 2. The 1991 Expedition to Himachal Pradesh*), *EW*, 44, 1, 第 13—82 页。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金伯格) (1994b): 《来自喜马拉雅尔邦的印藏细密画 (1991 年考察报告)》(*Indo-Tibetan Miniature painting from Himachal Pradesh [Report on 1991 Expedition]*), *PIATS Fagernes 1992*, P.Kvaerne 编, 第 441—453 页, 奥斯陆。

Naraharinath (那热哈日那它) (Yogi) (1955): *Itihās Prakāś*, II/1. 加德满都, 尼泊尔历 2013 年。

Pelliot, Paul (伯希和) (1961): 《古代西藏历史》(*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巴黎。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39): 《拉达克历史研究》(*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加尔各答。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77): 《拉达克王国史, 约 950—1842 年》(*The Kingdom of Ladakh*),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51》(*Serie Orientale Roma LI*), 罗马。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84): 《尼泊尔中古史 (约 750—1482 年)》(*Mediaeval History of Nepal*),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54》(*Serie Orientale Roma LIV*), 罗马。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88b): 《亚泽、古格和布让: 一项新的研究》(*Ya tshe, Guge, Purang: A new study*), 刊于《亚洲历史论文选编》(*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60》(*Serie Orientale Roma LX*), 第 369—394 页, 罗马。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90): 《西藏中部和蒙古: 元—萨迦时期的西藏历史》(*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 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65》(*Serie Orientale Roma LXV*), 罗马。

Petech, Luciano (伯戴克) (1994): 《西藏王国的崩溃》(*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ibetan Kingdom*), *PIATS Fagernes 1992*, P.Kvaerne 编, 第 649—659 页, 奥斯陆。

Pranavananda, Swami(1983 [1949]): *Kailas-Manasarovar*, 新德里。

Richardson, Hugh E. (黎吉生) (1957): 《杰拉康的一则藏文题记, 公元 841—1042 年西藏历史的一个注解》(*A Tibetan inscription from Rgyal Lha khang; and a Note on Tibetan Chronology from A.D.841 to A.D.1042*), *JRAS*, 第 57—78 页。

Richardson, Hugh E. (黎吉生) (1971): 《永丹是谁?》(*Who was Yum brtan?*), 《纪念拉露西藏研究专辑》(*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第 433—439 页, 巴黎。

Richardson, Hugh E. (黎吉生) (1988): 《朗达玛的继承人》(*The Succession to Glang Darma*), 《纪念图齐东方研究》(*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罗马东方系列丛书 56. 3》(*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3*), G.Gnoli 和 L.Lanciotti 编, III, 第 1221—1229 页, 罗马。

Rose, L.E.(1971): 《尼泊尔: 生存的策略》(*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伯克利。

Schuh, Dieter (1985): 《西藏公文的政治暗示》(*Politische Implikationen tibetischer Urkundenformeln*), 《中亚历史研究档案》(*Archiv für Zentralasiat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9, 第 57—59 页。

Snellgrove, David L. (斯奈尔格鲁夫) (1987): 《印藏佛教: 印度的佛教徒及其藏族继任者》(*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伦敦。

Snellgrove, David L. and Tadeusz Skorupski (1977) (斯奈尔格鲁夫和斯科若普斯基): 《拉达克文化遗产, 第1卷: 拉达克中部地区》(*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Ladakh, Vol.1: Central Ladakh*), 韦明斯特。

Snellgrove, David L. and Tadeusz Skorupski (斯奈尔格鲁夫和斯科若普斯基) (1980): 《拉达克文化遗产, 第2卷: 桑噶和拉达克的石窟寺》(*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Ladakh, Vol.2: Zangskar and the Cave Temples of Ladakh*), 韦明斯特。

Satō, H. (1981): 《羊同国的位置》(*Yōdōkoku no shokai ni tsuite*), *Ōryō Gakuhō*, 7, 第45—70页。

Simth, E. Gene (简·史密斯) (1970): 《导言》, 刊《贡楚印藏文化百科全书》(*Introduction, Kongtrul's Encyclopaedia of Indo-Tibetan Culture*), 3部分, 钱德拉编 (L.Chandra), 第1—78页, 新德里。

Szerb, János (1983): 《822/823年的藏回条约》, 《西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研究, 奥地利维也纳 Velm 乔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81年9月13—19日》, 《维也纳藏学和佛学研究10》(*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10*), 斯泰因克勒和陶歇编 (E.Steinkellner & H.Tauscher), 卷1, 第375—387页, 维也纳。

Szerb, János (1990): 《布顿的西藏佛教史》(*Bu ston'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ibet*), 维也纳。

Tanaka, K. (田中公明) (1994): 《托林寺佛教遗址和札不让白殿(西藏西部): 现状和瑜伽续的图像学分析》(*The Buddhist Sites of Tholing monastery and the "White Temple" at Tsaparang [Western Tibet]: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iconography of the Yoga Tantra*), *PLATS Fagernes 1992*, P. Kvaerne 编, 第863—872页, 奥斯陆。

Thakur, Laxman S. (拉克斯曼) (1994): 《郭(普)再发现的天喇嘛益西沃的一则藏文题记》(*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the L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JRAS*, 4, 3, 第369—375页。

Thomas, F.W. (托马斯) (1951): 《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托马斯选译 (F.W.Thoma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ew Series, Vol.XXXVII*), part II: Documents, 伦敦。

Toscano, G.M.(1977): 《情系西藏: 本世纪传教士的报告》(*Alla scoperta del Tibet: relazioni dei missionari del secolo XVII*), 博洛尼亚 (Bologna)。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 (1933): 《印度-西藏 II: 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Indo-Tibetica II. Rin c'en bzang po e la rinascita del Buddhismo nel Tibet intorno al mille*),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 (1935): 《印度-西藏 III: 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 第I部分: 斯比蒂与库那瓦》(*Indo-Tibetica III. I temple del Tibet occidentale e il loro simbolismo artistico; Part I: Spiti e Kunavar*), 罗马 (英文译本, 新德里, 1988年)。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 (1936): 《印度-西藏 III: 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 第II部分: 札不让》(*Indo-Tibetica III. I temple del Tibet occidentale e il loro simbolismo*

artistico; Part II: Tsaparang),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37):《无名西藏的圣人与匪徒》(*Santi e briganti nel Tibet ignoto*) (*diario della spedizione nel Tibet occidentale 1935*), 米兰。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41a):《印度-西藏 IV: 江孜及其寺院 I》(*Indo-Tibetica IV. Gyantse ed i suoi monastery; Parte I*),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41b):《印度-西藏 IV: 江孜及其寺院 II: 题记》(*Indo-Tibetica IV. Gyantse ed i suoi monasteri; Part II: Iscrizioni. Testo e traduzione*)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49):《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3卷,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56):《两次尼泊尔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Serie Orientale Roma X),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71a):《喜马拉雅中国》(*Himalayan Cina*), 《纪念拉露西藏研究专辑》第548—552页, 巴黎。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71b):《西藏笔记》(*Tibetan Notes*), *HJAS*, 12(1949), 第477—496页; 引自再版 *Opera Minora*, 第II部分, 第472—488页, 罗马。

Tucci, Giuseppe (朱塞佩·图齐)(1973):《外喜马拉雅, 古代文明》(*Transhimalaya. Ancient Civilizations*), 伦敦。

Tucci, Giuseppe & Eugenio Ghersi (图齐和杰西)(1934):《图齐西藏西部科学考察报告, 1933年》(*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 nel Tibet Occidentale, 1933*), 罗马。

Uray, Géza (乌瑞)(1968):《古代西藏历史中一个年代问题》(*Notes on a Chronological Problem in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AOH*, 21, 第289—299页。

Uray, Géza (乌瑞)(1972a):《古代西藏历史中的王后赛玛噶的歌曲》(*Queen Sad mar kar's songs in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AOH*, 25, 第5—38页。

Uray, Géza (乌瑞)(1972b):《〈贤者喜宴〉中的法规和组织》(*The Narrative of Legisl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Mkhas pa'i dga' ston*), *AOH*, 26, 第11—68页。

Vitali, Roberto (维大利)(1990):《西藏中部早期寺院》(*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伦敦。

Wessels, C. (威色)(1924):《中亚的早期耶稣会士: 1603—1721年》(*Early Jesuit trave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 海牙。

Yamaguchi, Zuihō (山口瑞凤)(1977):《吐番和羊同的位置——附国川与大小羊同的研究》(*'Toban' no kokugō to 'Yōdō' no ichi; Fukoku-den to dai shō Yōdō no kenkyū*), *Tōhō Gakuhō*, 58, 第55—95页。

Yamaguchi, Zuihō (山口瑞凤)(1992):《古代古格王国的一次欺骗性叙述》(*Kodai guge ōkoku setsu no giman*), *Tōhō*, 8, 第59—74页。

Yamaguchi, Zuihō (山口瑞凤)(1995):《达玛王对佛教迫害的虚构》(*Daruma ōno habutsu wa kyok ō*), 《Narita 研究所佛教研究期刊》(*Journal of the Narita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8, 第1—30页。